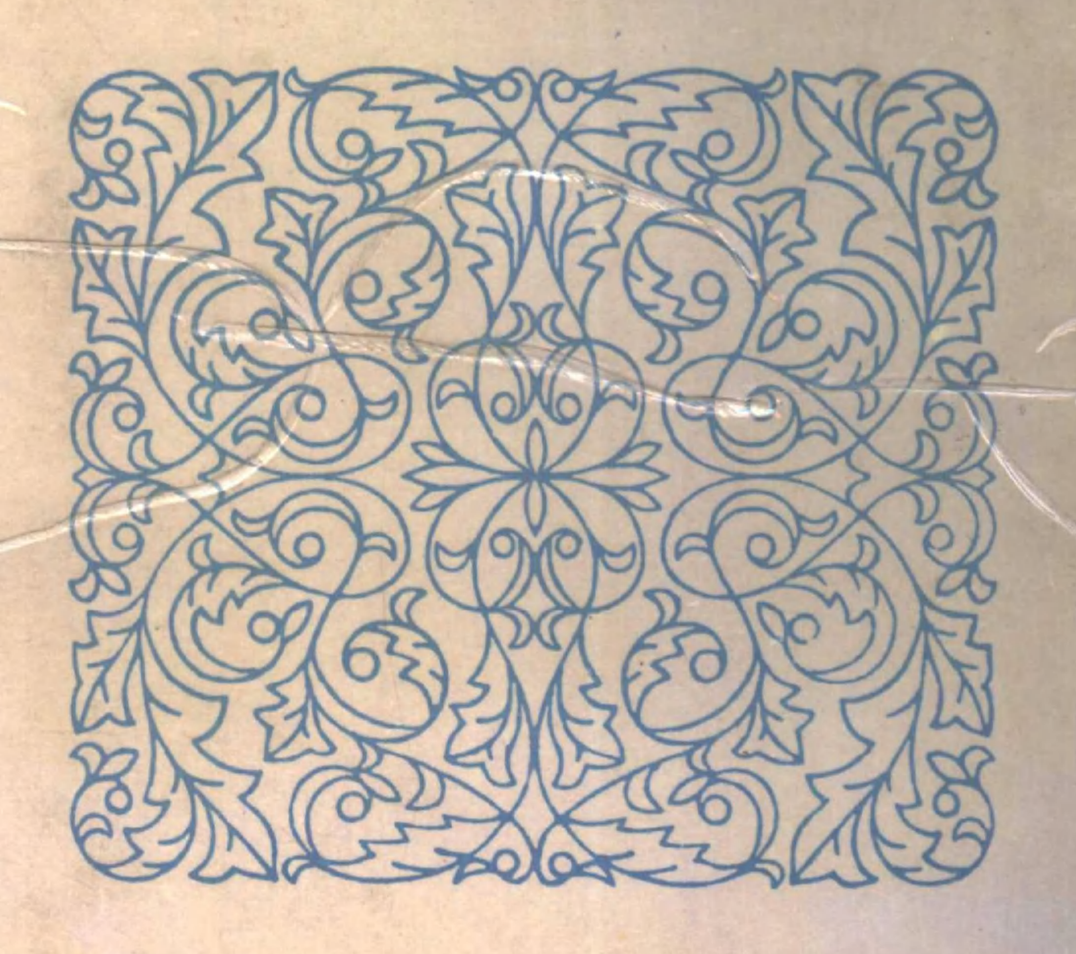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40·



民國叢書

第四編

·40·

文化·教育·體育類

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　方豪著

明日之中國文化　張君勱著

歐化東漸史　張星烺著

西學東漸記　容純甫述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　馮瑤林著

上海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

新時代史地叢書 歐化東漸史一冊 (10730)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撰述者 張星烺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目錄

歐化東漸史

第一章　歐化東傳之媒介

第一節　歐化界說

中國與歐洲文化，有形上及無形上，皆完全不同，上自政治組織，下至社會風俗，飲食起居，各自其數千年之歷史展轉推演，而成今日之狀態。東西文化孰爲高下，誠不易言。但自中歐交通以來，歐洲文化逐漸敷布東土，猶之長江黃河之水，朝宗於海，自西東流，晝夜不息，使東方固有文化，日趨式微，而代以歐洲文化。則是西方文化高於東方文化也。尤以有形之物質文明，中國與歐洲相去，何啻千里。不效法他人，必致亡國滅種。至若無形之思想文明，則以東西民族性不同，各國歷史互異之故，行之西洋則有效，而行之中國則大亂。各種思想與主義，無非爲解決民生問題。而勉

強效顰他人，使國中發生數十年或數百年長期亂事，自相屠殺，血流漂杵，人煙斷絕，以至國破種滅。吾人何貴乎效法此種主義耶？依此種情形觀之，歐洲之無形文明，各種思想，各種主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是否優於中國固有，與夫是否有效法之必要，不能不使人懷疑矣。但東西交通既起。有形貿易與無形貿易，滔滔不可復止。是在國中之政治家，善自掌舵而已。茲不論其高下，與夫結果之善惡，但凡歐洲人所創造，直接或間接傳來，使中國人學之，除舊布新，在將來歷史上留有紀念痕跡者，皆謂之歐化。為便利研究起見，分歐化為有形部，或物質文明部。如天文、曆法、醫藥、測繪、機器、輪船、鐵路、電報等等是也。無形部或思想文明部。如宗教、哲學、倫理、政治、文學等等是也。欲序述各種歐化史，不得不先序傳入歐化之各種媒介物。媒介物大概可分為三種。（一）由歐洲商賈、遊客、專使及軍隊之東來。（二）由宗教家之東來。（三）由中國留學生之傳來。吾故於序述歐化史之先，作導言，略述此三種之經過。

第二節　歐洲商賈遊客及軍政界人之東來

歐洲人與中國有交通，西漢以來已然矣。元代歐洲人來中國者，頗不乏人。然皆與今代之歐

化無關，蓋彼時歐洲人文化未必高於中國。東來者人數究亦不足誘起歐化。更無高深學者，足以引起中國人之敬仰心願就其門執贄者。元時歐洲人文化不獨未東傳，而東方各種大發明，如印刷術、火藥、羅盤針、紙等反由東向西傳播也。元亡明興，中歐交通中斷者約一百五十年。東方貨物尙可運入歐洲大概經由四道：第一道經中央亞細亞、薩馬兒罕、布哈拉、裏海北岸，再至黑海北岸，渡海至君士旦丁堡。第二道經印度大陸及印度洋、波斯灣、美梭博塔米亞、梯格里斯河，北至脫萊必松德(Trebizond)，抵黑海，再西至君士旦丁堡。第三道經油付萊梯斯河，至阿雷坡(Aleppo)，再至安都城(Antioch)，渡地中海達歐洲。第四道入紅海，抵埃及，達地中海濱。一千四百五十三年(明景泰三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旦丁堡。對於西歐各國，毫無親鄰之意。諸道皆爲土耳其人阻隔。歐洲人所嗜之調和物品、胡椒、丁香、諸物，俱不得入歐。故歐洲各國商人不得不另覓新道，以通東方。葡王顯理(Henry)獎勵遠航非洲西岸，希望於該洲南角，得一通印度洋之道。唯非洲甚長，遠過於葡人所計算者。數次蹈查，皆失敗而回。一千四百八十六年(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葡人狄亞斯(Bartholomew Diaz)初至好望角，沿海岸向北航若干程後，始歸航。報告國

人，非洲南端已窮盡，有新道可達東方。狄亞士發現好望角後十二年，而葡人竟得達其目的。一千四百九十七年（明孝宗弘治十年）七月，瓦斯柯達格瑪（Vasco da Gama）率小船三艘，自葡京立斯本起航，繞過好望角後，向東北航行，遠超以前狄亞士所至之地，直至桑西巴北二百邁耳。由是處作橫渡印度洋之壯舉。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弘治十一年）夏，抵印度西海岸古里港（Calicut）。在此將帶來之歐洲貨物，悉換作香料，滿載而歸。一千四百九十九年（弘治十二年）夏，三船安回立斯本原地。來回共需時二十六月。以前所久欲尋覓之歐亞新交通線，竟得成功矣。葡萄牙人急速利用此新發明，貿易東方。一千五百年（弘治十三年）三月，達格瑪歸回僅六月，派喀伯拉爾（Pedro alvares cabral）率船十三艘，滿載貨物，再往古里。至翌年七月，歸立斯本。一千五百零二年（弘治十五年）二月，達格瑪率船二十艘再往。自是香料及其他東方各種貨物，大宗流入歐洲。葡京立斯本不久即成爲歐洲最重要商埠之一。葡人利用其精良火器，摧敗印度洋上阿拉伯人之商業與勢力，獨霸東方海上。一千五百十年（正德五年）攻陷印度西岸之臥亞府（Goa），作爲根據地。次年又攻陷馬雷半島之麻六甲（Malacca）。（明史作滿剌加）遣

使至印度支那各邦政府，以通友好。白古（Pegu）暹羅、交趾支那，及東京，皆有葡國使節之足跡。葡人待麻六甲之中國商人甚為優渥。此等商人回國以後，對於葡人有極佳之報告。一千五百十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葡國商人初至中國海岸貿易，大獲利而歸。次年（正德十年）麻六甲葡國總督佐治達爾伯克喀（Jorge I' Alboquerque）遣斐來斯特羅（Rafael Perestrello）往中國。乘馬雷人海船，至一千五百十六年八月十二日無回音，乃復遣安特拉德（Gernao Perez d'Andade）再往，亦無功而返。抵麻六甲時，得遇斐來斯特羅。斐已至中國，獲大利而先歸矣。總督決意再遣安特拉德往中國。船上滿載胡椒。於一千五百十七年六月十七日起椗。同行者有皮來資（Thomas Pirez），以葡萄牙大使名義往聘中國。皮來資素充藥劑師，然為人敏捷，善於應對，使當外交官，頗為相宜。八月十五日，抵大門港（Tamang）。（在後川島。後川距上川不遠）。距中國陸地，尚有三海里。外國商船至廣東者，皆須寄泊於此。葡人欲往廣東省城，中國官吏不許。葡人強駛入內河，放礮舉敬禮。抵廣東後，國使皮來資與隨員登陸，中國人接待頗優，擇安寓以舍之。葡人所載貨物，皆轉運上陸，妥為貯藏。皮來資留廣州數年，以待明廷回文。直至一千五百二十

年（正德十四年底）一月，始得明武宗允許召見皮來資由廣州起程北上。先乘船至梅嶺山，棄船陸行往南京。行四閱月始至。武宗已先回北京。命使者隨至北京。一千五百二十一年一月，皮抵北京。葡人留廣州者多不法行爲，與中國人大起衝突。地方官吏奏參，武宗拒見皮，送之回廣州。一千五百二十三年（嘉靖二年）死於獄中。此爲葡國第一次遣使中國之經過也。葡人既不得志於廣州，乃北至浙江甯波（Liampo），賂地方官以重金，得留其地貿易。嘉靖十二年最盛時，每年達三百餘萬金幣。投資者無不獲三四倍之利。人口最多時，葡人達一千二百名，東方他國商人達一千八百名。葡人既富以後，驕奢淫佚，多不法行爲，與土人多齟齬。葡人法利亞（Faria）者嘗至南京，盜明孝陵寶物，歸匿甯波居留地。明帝大怒，乃下令討伐。陸軍由浙江進，海軍由福建進，兩面夾攻。焚毀甯波居留地及港中奇椗船艦三十五艘，盡殺外國商人，及基督教徒凡一萬二千人。其中有葡人八百名。時嘉靖二十一年，卽西曆一千五百四十二年也（亦有謂在嘉靖二十七年者）。甯波商市被燬後三年，葡人復以重金賂福建泉州地方官，得在其地貿易。葡商人行爲，無異在甯波者。嘉靖二十八年，泉州地方官及人民亦羣起驅殺葡人。全體五百名中，免死者僅三十人而已。

浙江福建皆無立足餘地，葡國商人復回至廣東上川島（西人名之曰聖約翰島）起塔蓬帳，爲臨時商場去則撤去。時海盜猖獗閩廣海岸，中國政府爲易於巡查之故，乃允許葡人在上川附近之浪白滘（亦作澳）居住，并可入廣州貿易。不久，浪白滘卽異常興旺。葡國居留民達五百名之多。大抵皆自南洋販運胡椒，與中國人交易絲綢麝香。香山縣南端有阿媽澳者，爲海盜所據。葡人勇敢，火器又精。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逐去海盜而佔領之。復以金賂地方官，得其允許，在該港建房舍，爲曬乾及儲藏貨物之用。葡人多拐人作奴。萬曆元年（西一五七三年）中國官乃築牆於澳門半島北面土腰，僅留一門以通出入。設官守之，而拐風不熄。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年），兩廣總督召所有澳門葡國官吏，總督判官等至肇慶，會商防阻辦法。中國官憲以驅逐出境相恐嚇。葡人出重賂乃得免。葡人在澳門地位之得保持，悉使用賄賂之功也。葡人常謂中國皇帝允許澳門爲葡人久居之地，不歸中國政權統治，而中國政府固未嘗承認，亦從無一人曾見中國皇帝之允許諭旨也。自最初葡人每年交香山縣政府租金一千兩，尤爲承認中國主權之明白證據。一千六百九十一年（康熙三十年）至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乾隆十九年）每年租金爲六

百兩。以後減爲五百兩。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葡人請求兩廣總督耆英，免去每年租金。耆英嚴拒，唯給與若干特別利權而已。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葡國澳門總督阿瑪拉爾（Amaral）斷然停止付給租金。中國亦無如之何。嘉慶間，拿破崙橫行歐洲時，英國人曾兩次暫佔澳門。中國官皆抗議其侵略中國土地。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中國承認其永久佔領權。澳門雖自初即爲葡國所承租，但爲西洋各國來廣東貿易者之根據地。所有遠來商船，皆先至澳門請領港人及糧食備辦人。由中國放洋回國者，亦皆先至澳門買船。每年在廣州營商者，事畢皆回住澳門，次年復回廣州。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英中鴉片戰爭後，香港崛興，五港通商，情形始改。澳門不獨爲鴉片之戰以前西國商人滙萃之地，而各國傳教師亦皆聚集於此。故爲前期歐化輸入之唯一門戶也。

葡萄牙人於明武宗時，重起中西交通以後，獨佔中歐間貿易者，約達六十年之久，無他國與之競爭。明穆宗隆慶五年，（西一五七一年）西班牙人越大西洋，經墨西哥，橫渡太平洋，征服斐律賓羣島。再閱三年，至明神宗萬曆二年（西一五七四年）冬，中國海盜林鳳（Limahong）率

戰艦六十二艘，男丁三千人，攻瑪尼拉市。爲西人所敗，北退林加煙灣。三年春，中國軍官王望高率福建巡撫及漳州知府之命，率戰艦二艘追林鳳至林加煙灣，得悉林已爲西班牙人圍困於彭加錫南 (Pangasinan)，將成擒矣。故決意歸國報告巡撫。西班牙總督拉維柴立斯 (Lavez aris) 遣奧斯丁會 (Augustine) 僧人臘達 (Martin de Rada) 馬林 (Geronimo Marin) 二名，及侍從數人，攜公牒隨同中國軍官至福建，表示友誼，禮聘福建巡撫，請求通商。巡撫優遇西使，將其請求轉奏皇帝。萬曆四年(西一五七六年)二月，中國使者至瑪尼拉，宣告帝旨，允許西班牙人在廈門通商。

葡人自西來，以澳門爲根據地。西人自東來，以瑪尼拉市爲根據地。兩國勢力會於中國門戶前南海中。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萬曆九年）西葡二國合併。一千五百八十六年(萬曆十四年)斐島總督總主教等，上書西班牙王斐律勃二世 (Philip II) 謂據探報，中國人皆懦怯無勇，兵隊皆以乞丐組成。請以一萬或一萬二千西兵征服中國。卽不能得全國，至少亦可佔領濱海數省。征服以後，照斐律賓辦理，先握其政權，再從事傳布基督教。西王不納。一千五百八十八年，（萬曆

十六年）西班牙水師大舉伐英。全師覆沒。國力衰耗，無暇東顧。征服中國之雄圖，不得不放棄矣。但在東方之勢力，暫時尚得保存。斐律賓羣島諸國，以前時常自相攻伐，華人畏往。西人入境，掃滅各邦，恢復秩序，商業大興。華人趨之若鶩。十七世紀初半，（明萬曆三十年後）西班牙國因投入三十年戰爭漩渦，國中兵力財富，俱皆損耗，國勢日漸衰微。葡萄牙國合併於西班牙達六十年之久，禍福與共，在亞洲之屬地，皆爲英荷二國所奪。在東方者，僅餘澳門一港，爲其所有。

荷蘭人初僅至葡京立斯本 (Lisbon) 間接販運印度胡椒等物。一千五百九十四年（萬曆二十二年）西班牙王斐律勃二世禁止立斯本與荷人貿易。荷人不得已，乃改計自往東方。一千六百零二年（萬曆三十年）組織荷蘭東印度公司 (Netherlands East India Company)，資本六千六百萬盾 (guilders)。翌年，遣商艦數艘至南洋羣島，販運貨物。獲大利而歸。一千六百零四年（萬曆三十二年）及一千六百零七年（萬曆三十五年），荷蘭人兩次至廣東，欲與中國通商，皆爲澳門之葡人陰謀所阻。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天啓二年），荷蘭水師提督萊佑孫 (Kornelis Rayerszoon) 率領戰艦十五艘，戰士二千人（其中荷蘭人九百名，馬雷人及日本

人一千一百名。）襲澳門。大敗而退，死傷甚衆。不得志於廣東澳門兩地，乃東據彭湖島。與西面中國大陸駛來之商船，交易貨物焉。一千六百二十四年（天啓四年）更東進而佔領台灣島。在島西面安平港築細蘭的亞礮台（Zelandia Castel），作根據地。台灣近中國，日本較之瑪尼拉港西班牙人，更爲捷近矣。荷蘭人治理台灣至一千六百六十二年（康熙元年），爲鄭成功所逐。成功以興復明室爲號召，而實則與獨立國無異。成功死，子經嗣位。經死，子克塽嗣立。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康熙二十年），清兵攻下廈門。荷蘭人以有宿怨之故，亦遣艦相助焉。清室入關以後，荷蘭數次遣使，請求通商。一千六百五十五年（順治十二年）爲郭佑（Peter de Goyer）及開塞耳（Jacob de Keyser）二人。一千六百六十四年（康熙三年）使者爲霍恩（Pieter van Hoorn）。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乾隆六十年）爲鐵清（Isaac Titsingh）及范百蘭（A. E. Van Braam）二人。每次使者皆卑身屈己，儕於藩臣貢使之列，行三跪九叩之禮，希冀可邀中國皇帝特許，准其在國內通商。然所得結果，則大失所望。清帝僅許其八年一貢，使船每次四艘而已。

英國人初時依賴荷蘭而得各種香料。以後荷人高抬貨價，每磅胡椒由三先令抬至六先令

以至八先令。倫敦商人，不得已乃於一千五百九十九年（萬曆二十七年）自組公司，直接往遠東販運香料。一千六百年倫敦東印度公司 (London East India Company) 自女王額里沙白 (Elizabeth) 領得特許證。翌年，遣商船五艘往印度。此時英人通商活動精神遠後於荷人。公司資本不厚。第一次派出商船時，即將所有資本用盡。一千六百零四年（萬曆三十二年）第一次遣出之商船平安歸回倫敦後，始又派出三船。荷蘭及英國兩東印度公司之至東印度，目的全爲通商。所有商船皆由私人資本派出。非若葡萄牙與西班牙二國欲開闢殖民地，或欲傳布基督教及歐洲文明於遠東土人也。然兩國公司，終亦不能使商業與領土擴張二事，完全分離也。英荷爲後起之國，與葡西二國，商業競爭甚烈。斐律賓羣島在南洋羣島之極北。面積甚小，易於防守。雖數遭荷人之攻，而西人終能守之。葡萄牙之東方帝國西起紅海口，東至摩鹿加羣島。橫亘東方全世界。兩端相去六千餘英里。地土分散，防守不易。且皆據咽喉之地，爲亞洲各國各民族通商必經之地，尤足引起英荷二國之嫉視，非奪取不可也。故葡萄牙之東方帝國全邊線，皆被侵襲。荷蘭人攻其東，英人攻其西。一千六百四十一年，（明崇禎十四年）麻六甲 (Malacca) 大海港，爲荷人

所得。一千六百十八年（萬曆四十六年），紅海口內莫夏港（Mocha）爲英人攻陷。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天啓二年），波斯灣口之忽魯謨斯港（Hormuz）爲波斯及英國聯軍所陷。此二港之陷落，尤爲致命傷。紅海及波斯灣之商業，由是不復爲葡人所有。英荷二國人，又煽動東方各地土人，助以火器抗拒葡人。葡人自是遂無能爲矣。英國人初僅注意於印度之商務，以後亦注其目光於遠東。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崇禎九年）東印度公司改組後，英王查理一世遣威德爾(Weddell)蒙忒內(Mountney)，羅賓孫(Robinson)，蒙德(Peter Mundy)四人，往中國經營商業。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威德爾率三艦一艇抵澳門港，求貿易。葡官不許。英船乃駛至廣州附近欲上岸，中國官不許。攻破岸上礮台。經各種困難及葡人之斡旋，始得滿載中國糖、綢緞、磁器等物而回英國。此次航行與當初所希望者相去甚遠。然威德爾謂以後在中國通商定可獲利。後十餘年，英人始再遣艦至廣州，亦未獲重利。至清初，英人以不得志於廣東，乃至福建交歡鄭成功。給以軍器，得其允許，在台灣及廈門兩地設立貨棧。鄭氏既亡，清室同等待遇荷蘭及英國，皆許在廈門通商。但清兵不知保護外商，百端敲詐。英人不堪其擾，乃復至廣州求市。斯時廣州地方吏治，

比較尙爲淸廉，不致如廈門之暴橫。經多時苦心，卒以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康熙三十八年）在廣州設立貨棧。自是以後，未嘗斷絕。一千六百九十八年（康熙三十七年）法國人閣爾伯特 (Colbert) 組織中國貿易公司 (Compagnie de Chine) 參加中國貿易。不久，瑞典、丹麥，亦聞風而起。十八世紀末，美國宣布獨立後，亦橫渡太平洋來中國貿易。中國沿海通商之地，尙有數港，然以廣州爲最大。至一千七百五十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淸帝下令止許廣州通商。其他各港，悉皆封閉。來廣州貿易之國甚多，然以英人爲首。一千七百三十六年（乾隆元年）來廣州貿易，番船共十二艘。其中英國五艘，法國三艘，荷蘭二艘，丹麥及瑞典各一艘。一千七百五十三年（乾隆十八年）來廣州者共二十七艘。其中英國十艘，荷蘭六艘，法國五艘，瑞典三艘，丹麥二艘，普魯士一艘。廣州官吏亦多敲侮外商。征收貨稅，漫無章程。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政府決意遣使中國，與政府協商改良方法，並請在天津、甯波、舟山等地通商。使者馬戛爾特尼 (Lord Macartney) 於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離樸資茅斯 (Portsmouth)。攜帶禮物六百箱。次年八月五日，抵天津大沽口。淸廷極爲優待，特派專使歡迎，備專船載使者至京。船

旗「書英國貢使」使者亦不抗議，蓋恐抗議而交涉中斷也。抵北京後，爭持朝見禮節多時。卒以見英國皇帝之禮見淸帝焉。所請求者俱不准。一千八百十六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復遣勳爵阿美斯德 (Lord Amherst) 來中國，謀改良商況。此年二月八日離樸資茅斯。同年八月二十八抵北京，復以爭持朝見禮節，未見淸帝卽南回廣東。自是而英人對中國情感益惡。以後政策，除宣戰，強迫使中國人改良通商情形外，或完全服從中國之苛政，或放棄與中國人通商。三者之中必擇一途，而後兩國始能平等磋商。積之多年，至道光二十年而鴉片之戰起。中國大敗，訂南京條約。賠款二千一百萬圓，割讓香港，開放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爲通商口岸，准英國派領事住居，并准英商帶家屬自由來往。以後兩國往來文書，用平等款式。南京條約公布之後，歐美各國莫不歡迎。如比利時、荷蘭、普魯士、西班牙、葡萄牙、美利堅、法蘭西諸國相率派領事或公使來廣東與我國訂修好通商條約。自是以後，有形之歐化，及無形之歐化，日漸輸入中土。每次戰敗，外患益烈，而歐化之輸入，亦隨之而益盛焉。初則中國人妄自尊大，蔑視外國，以蠻夷待遇歐美各國，繼則平等相視。拳匪亂後，物質與精神，中國人皆承認不如西洋人而自動歐化。事事模倣歐美。殆不擇

食，不顧自己能否融化，釀成今日消化不良之大亂局勢。

由上方歷史觀之，十六世紀時，來中國者，僅葡萄牙、西班牙二國。至十七世紀，荷蘭、英國接踵而至。加以葡、西二國，歐洲之國通商中國者，共凡四國焉。十七世紀時，英國人專力於印度遠東之商業，尙未盛旺。荷蘭人以南洋羣島爲根據，在東方之商務駕於葡西二國之上。至十八世紀時，英國人不但獨佔印度，即在中國南海上，商業亦推第一焉。綜數世紀之歷史觀之，在中國海面上商業，大概十六世紀推葡、西二國最盛。十七世紀荷蘭爲首。至十八十九兩世紀，則英國壓倒一切焉。於此時期，歐化東漸，俱由海道自西徂東。其主動力亦推此四國爲首。其他諸國皆依此四國而進焉。

北方俄羅斯國之東進，征服西伯利亞全部，直抵北太平洋沿岸，與歐洲人勢力東漸，有莫大之關係。然與歐化東漸，則關係極微。蓋俄羅斯本國之進爲歐化國家，僅於十八世紀初葉，彼得大帝時而已。明末淸初野蠻之科薩克軍隊爲尋黃金與貂皮，而占領西伯利亞，將莫斯科國（Muscovy）之勢力膨漲至太平洋濱。其人不足代表任何文明。其本身文明程度之低，與中國西北之

哈薩克人，額魯特人無以異也。秦漢以來，北方匈奴、柔然、突厥、蒙古諸族，皆由東亞向西膨脹。俄羅斯人特轉其方向，由西向東。更恢復蒙古時代之大版圖，使歐亞兩洲產生一統一政府耳。俄羅斯人戰勝喀桑(Kazan)及阿斯脫拉甘(Astrakhan)兩地蒙古人後，得恢復獨立，統歸莫斯科國治理。閱三十年至一千五百八十年（明萬曆八年），科薩克將葉爾瑪克(Yermak)踰烏拉山，侵入西伯利亞北部。其地滿布森林沼澤。遊牧民族所不居，僅有稀少之漁獵部族，如通古斯人，鄂斯帖克人(Ostiaks)，雅古特人(Yakuts)，居之而已。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崇禎十年）俄羅斯人在雷那河畔建立雅古特斯克(Yakutsk)礮台。再越二年而抵鄂菏斯克(Okhotsk)海岸。不久南下至黑龍江畔，與清室大起衝突。清室大勝。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兩國訂尼布楚條約。俄人放棄雅克薩城(Aibazin)，退出黑龍江流域，劃定疆界。直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咸豐五年）始再前進。尼布楚條約更許俄國通商。一千七百二十一年(康熙六十年)，訂北京條約，許俄國使臣駐北京，他國使臣不得享焉。一千七百二十七年（雍正五年），訂恰喀圖條約，劃定兩國邊界，並協定通商事宜。一千七百三十三年（雍正十一年），中國遣使至俄國。

終十八世紀全期，兩國外交甚爲親密。通商集中於庫倫及恰喀圖兩地，以駱駝代船舶。中國輸出者，茶爲大宗。由俄國輸入者爲黃金及皮貨。十一世紀時，俄國人始用額魯特人運入茶葉。不久卽全國嗜飲茶，較之英美兩國人尤甚焉。入十九世紀以後，俄人在北方，西歐人在南方，肆其精良之兵器，將中國四面包圍。中國仍欲保守其閉關自守政策，不願歐化不可得矣。二十世紀以前，中國輸入歐化，俄羅斯人無功焉。入二十世紀，西伯利亞大鐵路完成，爲中國人往歐洲留學之捷徑。至留學俄國之中國學生，仍極稀少。中國人新學，受自俄國者，亦極微末。國民政府在廣東成立，俄人與有力焉。以後共產主義之輸入，及共黨各處擾亂，生民塗炭，使中國國力消耗，亦俄人之賜也。

(參考Steiger History of the Orient C. A. M.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ches; Y. G.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明史佛郎機傳，荷蘭傳。)

第三節　基督教傳道師之東來

基督教傳入中國，第一次在唐太宗時，有西安府所存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及最近在甘

燉煌縣，鳴沙山石室中所發現唐時景教徒之各種譯述爲證。唐武宗時被禁絕。第二次傳入中國，當元代，歐洲人教士東來者，有孟德高維奴 (John of Montecorvino)，安德魯 (Andrew) 及鄂多力克 (Odoric) 等。信徒中有皇后，公主，親王，大將，駙馬等，人數頗盛，遠非近時之清代可比。元亡明興，其教亦隨之而亡。與近代之歐化東漸，亦毫無關係。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恢復中歐交通。時值歐洲人宗教熱重興，各教會皆極欲向遠方傳教。其中尤以新起之耶穌會 (Jesuits) 組織嚴密，不亞軍隊。會員皆有湛深學術，具刻苦犧牲精神。在歐洲則改良本教中腐敗，反抗路德新教，在他洲則尾隨探險家之後，極力尋覓新信徒。西葡二國政府，一方在海外擴充版圖，而同時亦負傳布基督教於異類之使命，以爲基督福音爲人類現在及將來幸福之要素，精神上無價大寶，將以公之於所有人類也。

方濟各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西班牙納襪辣 (Navane) 人，爲耶穌會發起人之一。熱心宗教，精幹多才。一千五百四十二年（明嘉靖二十一年）至印度臥亞 (Yoa) 傳教。在臥亞附近各地活動數年。至一千五百四十九年（嘉靖二十八年）往日本宣道。途中嘗經過廣州。抵日

本後，不久得悉日本文化皆來自中國。日本人對中國甚爲敬仰。因思若使中國改奉基督教，則日本亦必尾隨而來矣。沙氏爲人思想所及，必實行之。一千五百五十一年（嘉靖三十年）自日本歸回，道經上川島（在廣東台山縣正南海中）遇友人帕雷拉（Diego de Pereira），同至麻六甲。籌劃入中國方法。沙勿略更西至卧亞，得葡總督之贊成，任命帕雷拉爲往中國專使，沙氏爲隨員。欲代葡王與中國皇帝訂盟好通商傳教，及釋放葡國捕擄諸約。一千五百五十二年（嘉靖三十一年）四月離印度。同行者有僧人一名，非教會中人四名，及中國人安拖奴（Antonio）。安拖奴嘗在天主教學校中受教育，此行任翻譯員。至麻六甲時，帕雷拉亦加入。不意麻六甲葡國守官阿爾瓦羅(Don Alvaro de Ataide)無論如何，不許使團前行。反對理由不明。阿爾瓦羅者，著名航海家瓦斯柯達格瑪（Vasdo da Gama）之子也。卧亞及總督離麻六甲甚遠，葡王及立斯本京城，與教皇及羅馬城，更在萬里之外。沙勿略呼籲無門。在麻六甲、阿離瓦羅卽當地皇帝也。彼既阻撓，無法再前行。沙勿略百端設計曉諭，僅得以個人乘船往中國，不許攜帶禮物。帕雷拉留麻六甲亦不許陪行。以前專使聘問之議，完全放棄矣。沙勿略抵上川島，商季已屆。葡國商人在此者甚

多。沙氏欲由此往中國大陸。既入中國或可得機久留也。上川島上葡國商人以中國政府取嚴行閉關主義，商人等皆新近自大陸被驅至上川島，沙氏一人祕密往中國，若為官吏偵知，則遷怒商人，或竟上川島貿易權，亦被禁止也。故無一人贊助沙氏者。沙氏暗與中國某船長約，載至大陸。至期某船長失約。商期過，葡國商船悉離上川島航歸。沙氏一人與來船獨留。仍希望或有發達其目的。乃忽染病。船頗搖，苦不可堪。請求登岸養病。不意至年底竟一病不起，卒於島上臨時寓舍。時西紀一千五百五十二年也。中國譯員安施奴始終侍病在側。暫葬島中。以後移葬臥亞。近代史上，來中國基督教第一傳道師之事蹟如是。讀之猶如探險小說也。

沙勿略以後，第一傳道師能在中國久居者為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i），范亦耶穌會士，籍隸意大利。一千五百七十三年（萬曆元年，）耶穌會遣之至印度傳教。後又被遣至日本。路過澳門時，無意中竟羈留是地。欲入中國內地傳教。因請同國同會修士羅明堅（Michael Ruggerius）來中國相助。羅於一千五百七十八年（萬曆六年）至印度，一千五百七十九年（萬曆七年）七月抵澳門，學習官話。嘗隨葡國商人至廣州數次，得門徒數人。後數年，耶穌會派

帕修 (Francis Pasio) 及利瑪竇 (Matteo Ricci) 二人至中國輔助羅氏。帕修不久往日本傳教。利瑪竇則仍留中國。在中國基督教史上享盛名也。利瑪竇亦意大利國人。一千五百五十二年（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六日，生於安柯那邊界 (Mauh of Anchona)，瑪塞拉塔城 (Macerata) 少時，其父使之往羅馬學法律。當時青年人多志慕耶穌會士。瑪竇亦投入會中爲修士。初入會時，教師爲范禮安。由范之引誘，瑪竇發願往東方中國。在羅馬爲學生時，潛心研究算學，宇宙學，天文學。尤精天文。以後在中國即以天文學接近中國士大夫而著名也。一千五百七十七年（萬曆五年），請願往東方傳教。翌年抵臥亞。教書之暇，學習宗教學。一千五百八十二年（萬曆十年）應范禮安之召，至澳門。先學中國語言文字。次年（萬曆十一年）羅明堅與利瑪竇二人得入廣東省城肇慶府久居。二人初不欲即傳教，以免中國人誤會，僅以慕中華文物，觀光上國爲名，交接中國士大夫。西方時辰鐘，尤爲華人所驚羨。瑪竇繪一世界地圖，表明歐洲各國地位，而又特置中國於中央，以符中國士人舊觀念。其他各國皆爲邊疆裝飾品。精閑算學，尤足使中國士人信仰。居肇慶不多月，頗交接士大夫。耶穌會創辦人羅育膽 (Loyola) 生平傳教，不分貴賤。對於貧民，未嘗

歧視。然深信若能得上級社會信仰與贊助，則下級社會傳布工作，自易為力。上帝大榮譽亦易達到也。在中國此策尤然。所有傳教師無條約保障，全恃政府贍養輔助。若欲永久在境內居留布教，必須與國中之士人交歡，維持地位。蓋士為四民之首。所有政府官吏，皆自士人選拔而來也。明末中國學術界對於新知識，尚表示歡迎。亦有對舊哲學表示不滿意，存懷疑之心，而願承受外國新學說者。耶穌會士在中國，先以歐洲之技巧製造品，引起中國士人之好奇心，得其稱許。再進而證明有數種學術，歐洲人士研究較中國人為精密。待各種學術溝通以後，中國士人當可更進而研問歐洲人是否亦有哲學及宗教真理，可值注意也。明史卷三百二十六意大里亞傳言：『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啓輩首好其說，且為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明史此數語可以證明耶穌會人傳教策略之方法與成功矣。居肇慶數年傳教，成績不佳。一千五百八十五年（萬曆十三年）有友人在官者，請羅明堅及阿爾梅達（Almeida）二人北遊至杭州。始得一機會，深入中國內地。羅以後似又曾至廣西，前途困難甚多。各神父甚願歐洲各國君王能遣一公使，與中國皇帝磋商，

俾得允許在中國內地傳教。無皇帝特許，僅恃地方官恩情，甚爲不妥，且極危險。一千五百八十八年（萬曆十六年）羅明堅特回歐洲遊說各國君主，派遣使節。種種困難稽延，致羅氏於一千六百零七年（萬曆三十五年）卒於薩樓奴(Salerno)。西歸目的未達，竟辭此世而長去矣。

羅明堅既卒，中國傳教事業，仍進行不已。一千五百八十九年，在肇慶被逐。乃往韶州別立教堂。耶穌會人仍用其高深之算學，天文機器學，以得中國士大夫之信仰。利瑪竇等初入中國，皆衣佛教僧人之服。一則使人不注意，二則使人知其爲傳道師也。不久即知僧人在中國社會中地位不高。士人爲全社會中最要之分子。因此更改原來僧服，而用中國士人之服。瑪竇欲至北京，謀取得朝廷之允可，俾傳教事業有法律上之認可。初次努力，僅得至南京。不久被人反對南歸，至江西省城南昌暫居。一千五百九十八年（明萬曆二十六年，）經二十年繼續不停之努力，耶穌會在澳門以外地方，僅有會士七人，教堂三所而已。會友死亡者甚多，而對中國所予之印象極微。在他人必已失望，但利瑪竇仍忍耐從事，絕不灰心。謀欲達北京。會從某部尙書至北京。入城後，不久即被遣南歸至南京。得地方官允許久居，從事結交士大夫。頗得信徒。有徐光啓者，心襟尤寬，爲明末

學術界改革之先鋒。徐氏曾入相。從利氏遊，改奉天主教。自是爲教中柱石，忠於所宗。以其高位，文學謀略，對於宗教盡力輔助。光啓有女教中人稱之爲康狄達(Candida)，亦崇奉耶穌。早年孀居。獻身傳教。其功尤偉。氏使閭巷說書人學習基督福音，再演之於下級社會，使衆周知。今代中國耶穌會教育之中心，在上海徐家匯徐氏故宅，蓋即紀念徐氏也。利瑪竇堅忍不拔。經多年困苦，卒於一千六百零一年，達其所希望之目的地北京。得政府允許，可久居其地。利瑪竇在北京所施用之方略，一如在他城所行而獲大效者。以其所知之歐洲科學交接士大夫。利氏幷利用餘暇，極力攻讀中國四書五經。宣彼教時，極力引用中國經典，以博中國士人信仰。因之中國達官顯宦，多與之遊。爲之請於朝廷，給祿賜第。利瑪竇及其徒在北京之優越地位，對於全中國有良好影響。自是各處皆開放門戶，歡迎天主教教士。多年所希望之結果，竟如願收穫矣。韶州教會亦進步甚速。附近城邑，增設教堂多所，收錄教徒日多。用莊嚴典禮，公開施洗，民衆亦不反對矣。教徒未入教之先，依教師言，懺悔前惡，或自製懺悔辭。在北京竟有達官顯宦翰林學士以及天潢貴胄，皆來受洗。一千六百零五年（萬曆三十三年）時，北京共有新教徒二百餘人。耶穌會人來中國者日多。在澳門

設立學校，專為訓練本地傳教師之用。一千六百零六年謠言紛起，謂葡萄牙人勾結耶穌會士謀叛。澳門貯藏軍火甚多。事成推教士郭居靜（Cataneo）為帝。澳門附近人心惶惶。地方官戒備。教士稍受虐待。北京亦覺不安。但不久即平。一千六百十年（萬曆三十八年），由徐光啓之介紹，在上海立新會。此年利瑪竇卒於北京，賜葬阜城門外二里溝柵欄地方。喪禮及坟墓，皆依遺命，效法中國人風俗。利氏實為外交家。其在中國傳教成功甚大，留印象於中國人甚深。杭州志記其人「拳鬢碧眼，聲如洪鐘」云。深知欲基督教在中國普遍流行，必須其國文化制度改從西方，或教會必須改革向來教法習慣，以適合中國人生活情形。當彼時，欲求中國改革文化制度，以適合教會，為不可能之事。故彼取後法。改變教法，以應中國環境。此事引起以後禮節上大爭論。使耶穌會多年工作，受大打擊。而傳教事業，亦完全失敗。證明利氏所取之策略為是也。利氏臨終，耶穌會中友人就床榻前，問「君將死，留吾輩於何地。」利答以「吾留君於一門前。此門開後，有大功勳。但開時不無困難及危險。」此數語證明利氏所處之地位及精神也。利瑪竇輸入西學之功，亦可推為首。著書有天主實義二卷，畸人十篇二卷，辨學遺牘一卷，幾何原本六卷，交友論一卷，同文算指

十一卷，西國記法一卷，測量法義，萬國輿圖，西字奇蹟，乾坤體義三卷，勾股義一卷，二十五言一卷，圜容較義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利瑪竇死，天主教初期傳入之歷史亦告終。此期中天主教他會如方濟各會（Franciscans），與斯丁會（Augustinians），多明峨會（Dominicans）等，亦皆由西班牙人保護，自斐律賓羣島至澳門。試入內地但俱失敗。瑪竇死時，僅耶穌會在澳門以外，有教堂傳布福音，他會皆不能也。亦僅耶穌會人對於輸入歐化有功，他會皆無也。

利瑪竇死，依遺命以龍華民（Nicolo Longobardi）繼任。會基已固，各事照常進行，不以更換主任而見阻礙。龍華民為西錫利島人，家世閥族。一千五百九十七年（萬曆二十五年）抵中國。閱歷甚多。對中國傳教根本政策，有數端與利瑪竇大相逕庭。然二人交情甚密。故利生時，即薦龍以自代也。傳教事業日漸興旺。一千六百零六年（萬曆三十四年），熊三拔來華。一千六百十年，有會士六人自歐洲來華。一千六百一十三年（萬曆四十一年）復有四人來華。一千六百一十六年（萬曆四十四年）禮部郎中徐如珂，侍郎沈漼，給事中晏文輝，余懋孳等交章彈刻教士王豐肅（Alphonso Vagnovi）尊以天主教惑衆，一如白蓮無為諸教。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

通謀。神宗納其言，令豐肅及龐迪我，熊三拔俱退入澳門。熊三拔以一千六百二十年（明泰昌元年）卒於澳門。三拔精天文學。利瑪竇特請耶穌會派之來中國助修曆法也。三拔死，會中復遣鄧玉函（Terrenz）繼之。玉函未入教前，俗名施萊克（Schreck）。年三十餘，入耶穌會。精岐黃術，閑本草。復善算學。在歐洲時，嘗交遊義大利國著名物理學家蓋利流（Galileo）。深知修曆為中國要政。耶穌會人欲免除驅逐，不可不盡力為中國修曆。一千六百二十九年（明崇禎二年）以徐光啓之薦，復入欽天監。勤慎從事，克盡厥職。未及一年，至一千六百三十一年（崇禎二年）五月十三日死於職。繼其任者為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el Von Bell）。若望德國科龍城（Cologne）人。生於一千五百九十一年（萬曆十九年）。一千六百一十一年（萬曆三十九年）入耶穌會。修行勤學後，自請至中國傳教。一千六百十九年（萬曆四十七年），抵澳門。時正中國政府排斥天主教，故暫時不得入內地傳教。至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天啓二年）始入內地。鄧玉函卒後，被召至北京修曆法。後為會中主任。從湯入北京者，尚有羅雅谷（Jacques Rho）。同事數年。卒於一千六百三十八年（崇禎十一年）。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清順治元年），李自成破

北京，明室亡。清室自東北入關代主中國。傳教事業，不因鼎革而生阻障，反較前更盛。在北方則清順治帝留用湯若望爲欽天監。恩寵甚隆，頒賜官祿蔭及父母，賜地賞金，建築教堂，即今北京宣武門內南堂是也。堂成，帝御書碑文，頌揚天主教。碑雖非正式允許奉教自由，而其影響國內甚大也。在南方之教士，隨從明桂王者，其勢力較之湯若望爲更盛。教士瞿紗微（Andrew Koffler，又名 Andrewxavier）卜彌格（Michael Boym）二人皆受明永曆帝官爵。永曆嫡母王太后受洗，教名烈納（Helen），生母馬氏教名瑪利亞（Maria），妃王氏教名亞納（Anna），太子慈炫教名當定（Constantine）。粵閩總督龐天壽，教名亞基樓契利斯當（Achilleus Christao）。南明帝室奉教之故，不可確知。謂欲藉此可得西洋人之實力相助，以挽回頹勢，則不免揣測之辭也。卜彌格奉永曆帝命，出使教皇。歸卒於安南。瞿紗微在廣西爲清兵所害。清室統一以後，天主教士來中國者日多。在中國之新信徒亦與日俱增。康熙時，教中各會因「天主」，「上帝」，「天」三譯名，以及教徒跪拜帝王長官，奉祀祖先牌位，尊禮孔子等問題，互相攻擊。利瑪竇曾用「天主」「天」「上帝」三名譯以西文（God）。又謂禁止基督徒祭祀山川，佛老兩教神祇，以及他種偶像淫祀則可，

至若禁及祭祀祖先孔子，則攻擊中國人之國家及家庭，爲中國人所最不悅。必遭大反對，而基督教亦不能行也。在中國之耶穌會人士，雖不能全體一致擁護利瑪竇之說，而大多數則贊成之也。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丁會等，或因會務忌妬，或因國籍不同，情感各異之故，皆一致指斥耶穌會。辨論百餘年不熄。一千六百六十九年（康熙八年）至一千七百零三年（康熙四十二年）三十餘年間，爭論最烈。一千七百年時（康熙三十九年），耶穌會士請康熙帝解決所爭問題。帝意與耶穌會士相同。『中國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養育，譬如幼雛物類，其母若殞，亦必呼號數日者，思其親也。……況人爲萬物之靈，自然誠動於中，形於外也。……敬孔子者，聖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垂教萬世，使人親上死長之大道。此至聖先師之所應尊應敬也。』中國敬天，並非「以天爲物。」西洋人『不通文理，妄誕議論。若本人略通中國文章道理，亦爲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卽目不識丁。如何輕論中國理義之是非。卽如以天爲物，不可敬天。此卽大不通之論。譬如上表謝恩，必稱皇帝陛下階下等語。又如過御座無不趨蹌起敬。總是敬君之心，隨處皆然。若以陛下爲階下座位，爲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國敬天亦是此意。』呼天爲上帝，卽如稱朕爲萬歲，

稱朕爲皇上。稱呼雖異，敬君之心則一」（見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會中人將康熙帝宣旨及其他中國學者之解說寄往歐洲，而教皇克萊孟十一世 (Clement XI) 終不聽。卒於一千七百零四年（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下令禁止「用上帝」「天」等字，僅許用「天主」以譯 God。教堂內不許牌位上有「敬天」字樣。基督徒不許祭祀孔子及祖先。欲祀祖先者，牌位上僅許書祖先之名，不許書「神之位」字樣。羅馬教皇一令，停止百餘年之爭論。但在中國如何行使其令，中國爲獨立國，非他人附庸，行之與已成立之教堂，是否不發生不良結果，教皇等不問也。康熙五十九年，帝見教皇禁令，硃批云：「覽此告示，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是和尙道士異端小教相同。比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欽此。」因此教士被逐回國者甚多。天主教在中國自是發展遲緩，毫無進步，幾至於絕者一百二十餘年。直至道光末，鴉片戰爭後，藉用政治勢力及兵力，始得再行。教徒在中國多享特別權利，不守本地法律，倚服教士，欺陵鄉閭。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中國人自是對於基督教存一畏懼心理。上等社會

不敢接近矣。入民國，教案止息。稍稍復有上等社會人與之過從來往矣。民國十二年，已故大公報主筆英華字斂之，與美國本篤會士司泰來、奧圖爾等在北京創辦輔仁大學。爲天主教在中國第一大學。天主教注重紀律。當此國家社會改造之際，各種學說無限制輸入。狂士提倡廢孝，而內地無知青年，竟有以殺父爲英雄豪傑者。中國人民將流爲梟獍矣。天主教人獨以道德紀律爲倡，未始非狂瀾中一砥柱也。

路德新教創於十六世紀、十七世紀末葉（康熙三十年後，）歐洲北部奉新教者，有瑞士、德國北部，瑞典、那威、荷蘭、蘇格蘭、英格蘭，及威爾斯之大部，愛爾蘭之一部。十七世紀以前，奉新教諸國，對於海外發展，皆不注意。美洲及亞洲爲歐洲南部天主教國家所佔領者，皆不許新教傳道師居住。此期新教領袖，皆埋頭組織教會，爭論教義，防衛自己宗教地位，無暇顧及海外傳教。十七十八兩世紀中，德國新宗教家皆謂基督教徒無向外傳教之責任也。新教國家之君主，亦無舊教君主之熱心，且有反對傳教者。十八世紀末（乾隆末嘉慶初，）歐洲以外人羣社會中，僅有少數新教傳道師。直至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全體新教始活動傳教事業。近代歐化之輸入中國，新教徒

之功高於舊教徒。翻譯新書，灌輸新知識及各省設立教會學校，自小學，中學，以至大學。使中國中上社會子弟，受新教育。在本國有相當預備，得往外國大學或研究院再得高深教育。新教徒之功尤偉也。新教最初傳道師來中國者，爲英國人瑪禮孫 (Robert Morrison)。一千七百八十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氏生於諾森姆伯倫 (Northumberland)。長成於教會家庭中，自幼熱心傳教。年十五六時，入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在倫敦爲學生時，即已發願，將來至中國傳教。自大英博物館借得中國書，請某中國人教之。未至中國而中國語言已閑熟矣。一千八百零四年（嘉慶九年），自薦於倫敦傳教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而英國東印度公司反對傳教。不得已，乃往美國。乘美國船往中國，得美國國務卿馬第孫 (Madison) 致美國駐中國領事之介紹函。由紐約出航，於一千八百零七年（嘉慶十二年）九月中抵廣州。延中國天主教徒二人，再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一千八百零九年（嘉慶十四年），爲使本人在中國地位穩固之故，乃入東印度公司充翻譯。一千八百十六年（嘉慶二十一年），隨英國公使阿美斯德 (Amherst) 至北京充翻譯。第一天主教教士沙勿略嘗欲依附葡萄牙國商人公使入中國，而第

一路德新教教士瑪禮孫亦利用英國商人公使以入中國。誠可謂兩相映對矣。顧瑪禮孫雖為東印度公司翻譯，職守不廢以外，心中固未嘗一刻忘傳教大業也。脫離公司，則無所依附，求他途徑，而又無門。所幸生性好學，勤苦過人。既無他種方法可以傳教，乃專心於文字工作。一千八百十九年（嘉慶二十四年），與米內（Milne）二人用淺近文理，譯完新舊約全書。更著第一部中英文字典、中國文法書等。大半時間消耗於著述，與中國人交接甚少，故受其洗者寥寥無幾。氏與其徒在中國傳教二十五年，受洗入教者僅十人而已。瑪禮孫欲在廣州或澳門建一英華學校（Anglo-Chinese College），俾可為傳教中心點。但兩地皆有大阻障不得行。乃於一千八百十四年在麻六甲（Malacca）擇地建舍。斯時新嘉坡尚未建立。印度以東，在英國人管轄下者，僅麻六甲城而已。麻六甲有華僑數千人。立學校先行教導僑民西方文化。英國人願學中文及中國文化者，亦可入校。此校實中西文兼授。一千八百十八年（嘉慶二十三年）校舍成。瑪禮孫自捐英金一千磅為基金，又年捐一百磅為行政費。東印度公司亦年捐若干。初開學時，約有學生二十餘人。第一班所習之功課為地理、幾何、天文、倫理，英文及漢文。管理者為米內。此校之立，不免超過時代。英國人

入校極少，而中國上等社會又不需要此等訓練。來學者僅商人或外國人雇員。不久功課改淺。前十五年間，畢業者有四十八人。內有十五人受洗。米內卒於一千八百二十二年（道光二年）。他人繼其任。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條約成立。學校遷至香港新屬地。當時在麻六甲所辦者，英華學校以外，尚有印刷局一所，專印新教中出版物。又有雜誌兩種。一為華文月刊，二為英文季刊。瑪禮孫卒於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八月一日。壽僅中年。葬於澳門。氏無沙勿略或利瑪竇之才，但見解甚高，為人誠懇，心思專一，學識淵博，是非判明。新教中罕見之人才也。瑪禮孫既卒，其友人為之捐款作紀念。翌年會成，名曰「瑪禮孫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第一次捐款得美金四千八百六十元。即刻以一部贈之已成立學校數處。又在澳門另成立一新校，校名為瑪禮孫學校 (Morrison School)。延請美國人勃朗 (Samuel R. Brown) 為校長。此校後又遷至香港。校中著名學生有容閎，黃寬二人。容黃二人為中國近代最早留外國學生。容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下節復有詳記。黃先至美國，後至英國愛丁堡大學學醫畢業。懸壺香港，為中國最早知西醫者。瑪禮孫生時，未得見本人志願得遂。死後其友人繼承之。

九泉之下，亦可含笑矣。

美國脫離英國獨立，但對外傳教事業，仍多與英國合作。美國教會最早來中國者爲公理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九年）遣阿拜爾 (D. Abeel) 及裨治文 (E. C. Bridgman) 二人來中國傳教。一千八百三十年二月二人抵廣州。阿拜爾居一年卽回美國。裨治文留粵學中國語言，未久，創立一小學，教導兒童，從事著述。一千八百三十一年（道光十一年）由美國取得印刷機一付。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五月，起始發印中國文庫雜誌 (The Chinese Repository)，目的不獨爲播佈傳教新聞於外國人，同時亦宣揚中國法律、風俗、歷史、文學及時事於歐美人士。歐美商人在中國者，多不知中國事情而輕視中國。此雜誌灌輸中國知識於西人，使之了解中國事情，功不淺也。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公理會遣彼得伯克 (Peter Parker) 至中國傳布醫學知識，是爲最早教會醫生至中國者。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在廣州立一眼科醫院。治愈多人。以前中國人對於西醫有各種誤解，至是完全剷除。後於公理會來中國者爲浸禮會 (Baptists)。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

十六年）叔克 (J. Lewis Shuck) 氏爲該會第一代表人抵澳門傳教。幸運不佳。第一教友不久脫教。叔克非常灰心。會中所給薪俸甚微，不足自養。與他教士，復多齟齬。次於浸禮會來中國者爲安立干會 (Anglican) 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有洛克吳德(H. Lockwood)及漢生 (F. R. Hanson) 二人代表該會抵廣州。不久至新加坡學習語言文字。數月後，往爪哇巴塔維亞城。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皆因病回國。該會眞正創始代表人爲彭恩(William J. Boone)，一千八百三十七年抵巴塔維亞，後至廣州。第四美國教會至中國者爲長老會 (Presbyterian)。此會初與公理會合作。一千八百三十七年自立董事會。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前美國參議院議員婁麗(W. Lowrie) 辭去議員職務，專事傳教。先至新加坡，後至中國。南京條約以前，僅澳門廣州兩埠允許外人居住。故教士輸入歐化亦至有限。此期教士工作，僅限於翻譯聖經及少數雜誌而已。

鴉片戰後，南京條約成立，香港割讓於英。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五港，開爲通商碼頭。外國人居住地增加。天主教及路德新教各會活動範圍，亦因之大爲增加。傳教師來華人數激增。天主

教將中國劃爲數區。交各教會分區傳教，不相妨礙。耶穌會(Jesuit)不復在北京立總部，而另於上海附郭之徐家滙明代徐光啓舊宅立總會，作活動之總機關。設高等學校教導華人。設圖書館收藏中國舊書，立觀象台測量沿海氣候。又立動植物博物院及印刷所，出版中西文書籍。儼然爲一學術中心點也。味增爵會(Lazarist)得河南、蒙古、江西、浙江、河北一大部爲其傳教區。多民我會(Dominican)得福建。巴黎外國傳教會(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得滿州、廣東、廣西、海南、雲南、貴州、四川、西藏等地。方濟各會(Franciscan)得湖南、湖北、山西、陝西、山東。各會極爲努力。時新教(下方稱耶穌教)各會更形活動。輸入歐化於中國及使歐美人了解中國事情之功，以前歸之天主教；自是漸入新教徒之手矣。英國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將麻六甲之英華學校遷至香港。隨學校而來者，有其校長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爲一著名學者，後爲牛津大學教授，曾翻譯中國四書五經成英文，介紹中國文化於歐洲。其功甚偉。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至上海。譯米納氏(Milner)大英國志爲漢文。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艾約瑟

(Joseph Edkins)抵上海。氏爲有名學者。關於中國有甚多著述，尤精於中國佛學。一千八百五十年（道光三十年）美國長老會遣丁韙良（W. A. P. Martin）至甯波傳教。丁氏以後爲北京政府設立之同文館館長，同文館卽今北京大學之前導。教導中國學生以外，著述宏富，嘗翻譯萬國公法爲華文，輸入西學，厥功甚偉。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美國公理會教士衞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之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兩巨册著成，傳布中國歷史、法律、社會、風俗於歐美。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英國外國聖經會遣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至上海。偉烈知天算，居中國三十年。與中國士大夫交遊甚廣，著述宏富。有幾何原本續篇之譯。氏輸入西洋科學於中國，販運中國科學於西洋。功亦不淺。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元年）美國聖公會（Protestant Episcopalians）在上海建一幼童學校，以後逐漸擴張，成今日之聖約翰大學。爲中國培造政界學界商界人物甚夥。咸豐庚申年，（一八六〇）英法聯軍破北京，逼清帝再訂通商傳教條約，增牛莊、煙台、台南、淡水、汕頭、瓊州、南京、漢口、九江、鎮江爲商埠，教士受保護，傳教來者更多。歐化輸入更易。商埠中有教會，官吏，商人各團體成立。自此種團體發生各

種影響。以後五六十年時間，使中國人思想，政治、社會家庭各種組織，皆起莫大變化。

由咸豐庚申（西一八六〇年）至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四十年間，中國外狀及歐化輸入，無多大變遷。但各方所積之壓力，已使中國不能保守舊狀，不得不變而歐化矣。此時期有功於輸入歐化者爲美國長老會駐山東登州牧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狄氏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立文會館於登州，教育中國青年。近時名人吳佩孚卽斯時學生之一也。文會館以後併入濟南齊魯大學。狄氏精於算學，編有筆算數學，代數備旨等書，爲中國三十年前初辦學校時，各校所採用之算學教科書也。美國聖公會主教施若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於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在上海建立約翰書院，以後改名聖約翰大學。近代外交界名人顏惠慶等，皆此校之畢業生也。美國美以美會（Methodist）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於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抵中國。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在上海建中西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近代名人畢業此校者亦甚多。此校以後改滬江大學。林氏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創月刊萬國公報（A Review of the

Times）,灌輸西國思想於中國士大夫。光緒戊戌以前,中國人所知外國事情,端賴此報。林氏尙有中東戰紀等書之輯。極力鼓吹中國須變法維新。與戊戌維新黨人來往甚密。美國長老會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於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光緒二十年)在上海立尙賢堂(The Mission among the Higher Classes of China.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更名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中文名仍舊。)專務交結中國上等社會得中國總理衙門之贊助,用演講及出版物,灌輸西洋文明於中國士大夫。傳教目的未達,而傳播西洋科學之功,固不可泯也。英國浸禮會(Engl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道光二十五年)生於威爾斯。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來抵中國。先至山東青州傳教。時山東風氣未開,反對傳教。氏以堅忍精神,卒得久居。其傳教方法,亦如明末利瑪竇。以不變中國風俗,交結上等社會入手。活動範圍甚廣。宗教以外,注意改良中國經濟及學識。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山西大饑。氏往放賑之外,教地方官民以開渠、植樹、農礦諸事。俾可永久免除荒旱之災。留山西八年,用出版品及演講,結識士大

夫，免中外隔閡。氏甚讚美中國文化，而西國科學有利於中國國計民生者，亦極力介紹。主持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多年，出版書籍雜誌甚多。嘗與上海人蔡爾康合譯馬懇西之泰西新史攬要(Mackenzie's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賣出一百萬部以上。翻版及節本者尚不在內。每當各省科舉鄉試，士紳羣集之期，該會運至各省城推銷其出版品。故士紳獲得新知識，皆斯會之功也。戊戌維新黨首領，康有爲、梁啓超，皆與氏爲莫逆交。梁氏且曾爲氏之短期記室。廣學會經費，不獨英美人士慨然解囊，即中國之達官顯宦，如李鴻章、張之洞、聶緝規等，亦皆踴躍輸將。光緒帝亦曾讀會中出版書。故延氏至北京爲顧問。拳匪亂後，氏請英政府留賠款五十萬兩銀於太原府，立山西大學，教育華人，啓發新知識，庶可免其將來之排外。英政府許之，任命氏全權管理山西大學。十年以後，再交還大學於中國。第一任校長爲敦崇禮(Moir Duncan)，斯卽今日山西大學之起始也。自明末有西洋傳道師以來，功業之偉，未有如李提摩太者也。英國人傅蘭雅(John Fryer)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抵香港，充聖保羅書院(St. Paul College)教員。後江南製造局請之與華人

合譯西書。範圍甚廣。所有算學、化學、生物、物理、地理、音樂、身理、衞生、天文、歷史、哲學、神學、教育、法律等學，皆有譯本。直至如今，其所訂名辭（如輕氣，養氣之類）尙留於人口不可廢也。又有教士受中國政府之聘，代中國組織學校，充教務長者。如天津西沽北洋大學之成立，在光緒二十一年。實盛宣懷於中日戰後，延請美國教士丁家立（Charles D. Tenney）所組成。中國專科大學當以此校爲始。丁氏先在山西公理會傳教。後至天津充美國領事館翻譯及副領事。並在李鴻章家授李經楚英文。上海徐家滙南洋公學，亦爲盛宣懷延美國教士福開森（John C. Ferguson）組成。教成人才甚多。當時科舉未廢，本國人留學外國者少。專科大學課程編配，專賴外國人之指導。美國教士尤多竭誠盡職。翻譯書籍，組織學校以外，各教會在中國各地設立印刷所，印刷書籍與宣傳品。其技術與組織法，給中國人以莫大影響。卽如今國中最大之書局，商務印書館之創始人，亦自教會印書館學得其技能也。在歐化輸入中國之初期，教士之功，誠不可泯。庚子拳匪亂後，本國東西洋留學生大增。歐化輸入之功，乃由教會手中移歸本國人矣。猶之漢魏以後，印度佛教之傳入中國，初期皆爲外國人，以後乃有本國人，如法顯、玄奘、義淨也。今代教會中人輸入歐化於中

國，雖已讓首功於中國留學生，但輸出中國文化於歐美，著書立說，使歐美人了解中國事情，仍常佔第一位也。各處教會所立之大中小各級學校，皆頗爲中國士大夫所信任。良以本國政治無常軌。各級學校，皆受政治影響。經費不裕。校長教員，隨政潮爲進退；一歲之中，數次換人。人懷五日京兆之心，不知職任爲何物。學生投入政黨，甘爲政客攘奪之工具。以奔走運動，虛僞囂張爲習尙，讀書實驗爲可恥。在此時期，教會學校，仍本其良心職任以行。校規嚴明。學生尙能安心讀書，實事求是。大爲中國社會所尊視。

（參觀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on Missions in China; G. G.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樊國樑燕京開教略。）

第四節　中國人留學及遊歷外國

自明武宗正德時，葡萄牙人東通中國後，歐洲商賈教士至中國者甚多，前二節已言之矣。而中國人往西洋者，究有若干人歟？留學生爲輸入歐化最要之媒介，不可不有專節論之也。中國最早往歐洲留學者，似爲鄭瑪諾。瑪諾字推信，廣東香山澳人。自幼往西國羅馬京都，習格物、窮理、超

性之學，並西國語言文字，深於音學，辨析微茫。康熙十年，辛亥，來北京。十三年甲寅卒。墓在阜城門外滕公柵欄。康熙時有馬公瑪竇者，意大利人也。泛海三年始至中國。後敷教北京，以丹青天文馳名。康熙帝以賓禮待之，每與帝遊，極其禮愛。後設帳於京。及聖祖崩，馬公請歸。上問其所欲。對曰：「願得英才而教育之。」上忻然允諾。及歸至那波利港（Naples）乃以立書院之事請命於王。王許之。爰建高館於城內，名聖家書院，亦名中國學館。專教華人。嗣後華人往者頗不乏人。大率湖北人，往其處學習宗教也。道光三十年，有蘇人陸霞山與同志二三人，航海西經緬甸、印度、阿非利加、法蘭西、西班牙、抵意大利那波利府，肄業於聖家修院八年。至咸豐七年，返棹回國，充楚北司鐸。宗教家皆主靜修，獨善其身，不願多與外界交遊，不注意政治學術，故鴉片戰前，由中國往歐洲留學宗教者，雖代不乏人，而求其有影響於中國文化則甚微也。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時，外國使來中國者甚多。教化王（即今之教皇）之使亦曾數至。然清朝在此一百三十餘年長期間，竟未一次遣使浮海至西歐，採風問俗，誠可異也。嘉慶間，有嘉應州人謝清高，從賈人走海南，遇風，覆其舟，拯於番舶，遂隨販焉。遍歷南洋、印度洋、歐洲、美洲、太平洋諸地而回。其鄉人楊炳南為之記，頗

名曰海錄。謝氏爲近代最先中國遊歷家至歐美者。海錄所記，不過風土人情與商況。至若政治，宗教、學術、非其所及也。書中無特別記載，可以引起人注意者。故書出版於世，無多大影響也。最先留學生回國後，在政治上有影響者，當推粵人容閎。氏字純甫。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道光八年）十一月，生於距澳門西南可四英里之彼得島南屏鎮。一千八百四十一年（道光二十一年）進瑪禮孫學校。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一月四日，隨校長美國人勃朗(S. R. Brown)經印度洋、好望角、聖希利那島、渡大西洋而至美國紐約。共行九十八日。至是年四月十二日達目的地。同行者尚有黃勝、黃寬二人。三人共入美國麻沙朱色賓州 (Massachusetts) 之孟松學校 (Monson Academy)。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黃勝因病返國。容等期滿，因資助者欲二人去英國蘇格蘭愛丁堡習專門。黃寬乃去英，學醫七年。以第三名畢業。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歸國懸壺。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逝世。容不願去英，以喬治亞省薩伐那婦女會之助，及自己工作所入，得留美。一千八百五十年（道光三十年）入耶路大學 (Yale University)。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咸豐四年）畢業該校。斯年十一月，由美起行，復經好望角返

圖。初營商。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至南京謁洪秀全之姪干王。說以七事，冀太平軍之能用其言而改造中國。但結果不能如其所期。仍爲茶商，往來皖贛各省。特別注意社會現象。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正營業九江、曾國藩幕友張世貴李善蘭（壬叔）等相召。是年八月至安慶見曾。十月，奉曾命去美購機器。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春，攜機器返國。置廠上海，即今江南製造局也。已而復說曾於廠旁立廣方言館。招學生肄業其中。授以機器工程上之理論與實驗，以期中國將來不必需用外國機器及工程師。此校以後造就人材甚多。又上說帖於江蘇巡撫丁日昌。條陳四則：一、中國宜組織一合資汽船公司。公司須爲純粹華股。不許外人爲股東。即公司經理職員，亦概用中國人。二、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儲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學額以試行之。此一百二十人中，又分爲四批。按年遞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學期限定爲十五年。學生年齡，須以十二歲至十四歲爲度。視第一第二批學生出洋留學著有成效，則以後永定爲例。每年派出此數。派出時，並須以漢文教習同往。庶幼年學生在美，仍可兼習漢文。至學生在外國膳宿入學等事，當另設留學生監督以管理之。三、政府宜設法開採礦產以盡

地利。礦產既經開採，則必兼謀運輸之便利。凡由內地各處以達通商口岸。不可不築鐵路以利交通。四、宜禁止教會干涉人民詞訟以防外力之侵入。四條皆爲當時切實要務。惜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始得機會，蒙曾文正將其第二條入奏得准。於是組留學事務所，設監督二人，漢文教習二人，翻譯一人。監督爲陳蘭彬及容閎。學生暫定爲一百二十人，分四批。每批三十人。按年分送出洋。學生年齡定爲十二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在上海先立一預備學校。北方風氣未開。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夏，第一次招考竟未足額。乃往香港英政府所設學校中遴選聰穎少年。故一百二十名官費生中粵人竟十居八九。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一年）夏季之末，第一批學生三十人，渡太平洋赴美國。立留學事務所於哈特福德（Hartford）。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光緒二年），陳蘭彬升任駐美公使，薦吳子登（名惠善）自代。吳性情怪僻。爲人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學司。接任之後，即招學生至使署中教訓。各生謁見時，均不行跪拜禮。監督僚友金某大怒。謂各生適異忘本，目無師長。固無論其學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爲中國用。具奏請將留學生裁撤。容閎力爭無效。卒於光緒七年，一律撤回。此爲中國政府第一次派赴美國留學生之經過也。後人對於此次

留學生之成績，毀譽不一。大抵毀之者多，譽之者少。要其成績無多之故，則學生年齡太輕，本國情形不熟，國學全無，在外國亦僅在高等學校修業，並未得進大學，學有專長也。其中有數人以後成專家者，蓋於調回後，第二次自費往美，畢其所業也。又約有十人，終身留美不歸。人人皆有一西婦。無怪監督吳子登謂其卽學成亦不能爲中國用也。然政界上以後多一批繙譯官，辦洋務人員，未嘗不無功績可述也。

以後光緒二年（西一八七六），李鴻章派天津武弁七人，隨德人李勱協去德學習陸軍。以三年爲期。是爲赴歐留學之始。光緒三年二月，李鴻章奏准，派遣福建船廠學生及藝徒三十名，赴英法兩國學習海軍與製造。以法人日意格爲洋監督，道員李鳳苞爲華監督，馬建忠爲隨員，陳季同爲文案，羅豐祿爲翻譯。此次學生成績，頗有可觀。有數人以後在軍界或在學界，皆爲名人。如薩鎮冰爲海軍界之名宿，嚴復爲輸入西洋哲學之先導也。光緒七年，並由李等奏請續派船廠學生十名去英法學習。以後卽停止。光緒十六年四月，由總理衙門奏准出使英、俄、法、德、美五國大臣，每屆酌帶學生二名，共計十名。均以三年爲期。光緒二十一年，再奏派學生分赴俄、英、法、德各四名，共

計十六名。惟所派學生均以襄贊使署公牘爲務，無暇求學。實不能謂爲留學生也。

甲午（西一八九四）戰後，中國自知國力遠遜日本。日本以前，步趨中國。明治維新以後，模仿西洋。一舉而爲強國，自有其長，可作中國之鏡鑑也。日本距中國近，費用較西洋爲輕。文字障礙，亦較西洋爲少。故往日留學者甚衆。官費之外，自費尤多。最盛之時，達萬餘人。日本固非西洋之國，但中國留學生所學者，皆日本人自西洋販來之西學。此間接輸入之歐化，較之直接自歐美輸入者爲尤要。一則留日人數衆多；二則文字相近，駕輕就熟故也。清末革命之演成，幾全爲留東學生之功績。今國中所用之新名辭，全自日本輸入。每年出版書籍，多自日文翻譯。三十年來，中國文體變遷，當導源於日本。大小工廠中技師，亦多留日畢業學生。法庭中判官，多爲歸自日本法政學生。中國每年所受精神上之刺激與興奮，悉來自日本。殷憂所以啓聖。彼所給吾人之刺激，或爲起死回生之針灸也。考中國派遣學生去日留學，始於光緒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當時公使裕庚氏經日本政府以學生十三人依囑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氏。嘉納使同校教授本田增次郎氏當其事。更又聘教師數人，開始日語日文及普通學科之教授。此等留學生中或罹疾患，或因事

故，致不得已而半途回國者，往往有之。有六名皆以良績卒三年之業。公使李盛鐸續送數名。鄂督張之洞，亦相繼咨送。於是嘉納氏以三矢重松氏，充教育主任。此等學生亦以良成績卒其課程，進修專門之學。光緖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北京警務學堂亦簡派警察學生數十人，以託其教育。光緖二十四年，始由政府令各省選派學生，留學日本。倡此議者，爲日本駐京公使矢野文雄。首先讚成此議者，爲御史楊深秀。中國學生到東後，不通語言文字。日人高楠順次郎於明治三十一年六月（光緖二十四年），首創日華學堂，專爲中國學生補習語言文字及各種學科，肄業期限約一年。再進帝國大學或專門學校。自此以後，各省均派遣學生赴日。私費前往者更多。拳匪亂後，變法之要求益切。一切新政，均須人辦理。各省競派。自光緖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五六年間，留日學生達萬餘人。爲任何時期與任何留學國所未有。各科學生中，尤以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者，影響於中國近二十餘年之歷史爲鉅。辛亥革命，推翻淸室，造成共和，士官學校畢業生率領新軍響應之功，當推爲首。而二十年來，分崩割據，日事閱牆，置國事於不顧，使生民塗炭，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者，亦士官學校畢業武人之賜也。

光緒三十四年（西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陽曆，）美國國會通過以一部分之拳匪亂事賠款，退還中國之議案。咨請大總統酌定以何時與何種情形交還中國。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大總統令，除扣去實應賠償之款外，均行退還。遂由美國財政部詳核決定，中國實應賠償之數，爲一千三百六十五萬五千四百九十二金元，另保留二百萬金元，爲或有未經查出應償之款之用。此外悉數退還。其保留之二百萬金元，續經查明，應扣付八十三萬八千一百四十金元。其餘均仍交還中國。美國既退還後，中國外務部卽與駐京美使，商定派遣遊美學生辦法。初四年，每年遣派學生約一百名赴美遊學。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續派五十名。在北京西郊淸華園地方，設立淸華遊美預備學校。約容學生三百名。延美國高等初級各科教習。所有辦法，均照美國學堂。以便學生熟悉課程，到美入學，可無扞格。淸華學校成立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而美國退還庚款，則始於一千九百零九年。故在淸華未成立及未有畢業生以前，於一千九百零九年八月，一千九百一十年，一千九百十一年七月，舉行招考試驗。所考之科目，皆准當時中學畢業入大學所需之程度。此三年考取之人數，計第一年四十七人，第二年七十八人，第三年六十二人。以後繼續派

送該校學生。至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已達六百八十九人。清華成立以後，赴美官費生日多，因爲人多之故，回國後在社會上勢力頗大。私費生往美者，亦大增。今日中國學生留學外國者，以日本最多，美國次之。在歐洲者，以法國最多，德國次之，英國又次之。但較日美二國，皆遠遜也。各國皆有其特長，而亦各有其弊。日本密邇中國，文字風俗相近。留日學生可以時常回國，故熟悉本國情形，不忘本國文字。日本人能耐苦。飲食起居，皆極儉樸，甚有較中國中等社會尤儉者。中國學生久留日本歸者，物質之慾望不奢。回國作事，無扞格隔膜之弊。中日兩國比鄰，衝突時有。在日留學者，無日不受日人之輕視刺激。故學生時代，愛國心較歐美留學者爲切。因之言論舉動，亦較爲激烈。清末革命，不惜以生命爲犧牲，前仆後繼，視死如歸，此留學日本之利，非他國所能及也。然中日兩國旣相爲鄰。而日人對於中國之事，纖悉皆知。處心積慮，破壞中國國家組織，以便從中漁利。清季煽動中國學生，排斥滿人，推翻清室。甚至有投入中國革命軍，協助革命者。彼其人果眞欲吾人革命成功耶？抑將別以求其所大欲耶？日人評論中國文明人物，皆別具心腸。使中國無自信之力。而中國人不察，反以爲眞確無誤，亦自攻其祖。入民國後，忽而唆使袁世凱爲皇帝，忽而協助蔡鍔以抗袁，

忽而挑撥南北感情，忽而助奉軍入關，忽而出兵攔阻北伐，實皆彼多年陰謀計劃，至此實現。中國上下皆墮其術中，而不知悟。此則其弊也。美國物質文明發達爲世界最。各種機械學，可稱無匹。其國富厚，亦稱爲首。美國大學課程表，學校多已爲學生編配妥當，不似歐洲之選擇自由，反使中國學生之初入學者，茫無頭緒。歐洲學校有所謂「讀書自由」而美國大學則主嚴格訓練。美國學校畢業以後，出世應用之學皆已完備。今國中各機關內，多半爲美國學校出身者，他國所不及也。但美國富厚，既冠於世界，而奢侈之風，亦爲他國所不及。衣食行住，窮極奢華。中國學生久居美國者，習於美國人之生活。驟然回國，見本國各事簡陋，輒生鄙棄。小事不屑爲，大事不能得。慾望不遂，而生憤恨。愛國之心，職任觀念，隨之削減。甚至詆本國爲半開化者有之矣。美爲民主政治國家。民主政治（德模克拉西）誠爲理想之良好政治。但中國人天生爲中國人，非可一朝一夕化爲美國人也。自美國或英國輸入民主政治於中國，完全不適中國民情，釀成今日之大亂，是則其弊也。

（參考韓霖張賡聖教信證；郭連城西遊筆略；洪勳遊歷聞見錄；容閎西學東漸記；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

第二章　有形歐化卽歐洲物質文明之輸入

第一節　軍器事業

鑄礮改良　各種有形歐化中，最早受歐洲人影響者，實爲鑄礮術。據續通考所載中國最初用火藥及礮，爲金哀宗天興二年（西一二三二年。）金主奔歸德，金將官努嘗以火槍破敵。其制以赭黃紙十六重爲筒長二尺。實以柳灰、鐵汁、磁末、硫磺、砒硝之屬。以繩繫鎗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鎗前丈餘。藥盡而筒不盡。元兵不能支，大潰。此卽世界上最初用火品之戰爭也。以後元人探知之，亦用以攻金哀宗於蔡州。史弼高興征爪哇時，嘗遺留數礮於其地。其造法不傳。後亦罕用。明史謂其得自西域者誤也。古所謂礮皆以機發石而已。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製用生熟赤銅相間。建鐵柔爲最，西鐵次之。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樁，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隨宜而用，爲行軍要器。永樂十年以後，北方沿邊要塞各山頂，

皆置五礮架以禦敵。然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愼惜之。宣德五年，敕宣府總兵官譚廣，神銃國家所重。在邊墩堡量給以壯軍威。勿輕給。正統六年，邊將黃眞、楊洪立神銃局於宣府獨石。帝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泄。敕止之。景泰時、應州民師翺製銃有機。頃刻三發及三百步外。天順八年，延綏參將房能破賊麓川，用九龍筒。一線燃則九箭齊發。請頒式各邊。西洋人未抵中國前，中國鑄礮銃術之發達史，約略如上。西洋人用火藥礮銃於戰爭，最早爲一千三百四十六年（元順帝至正六年）英法兩國克萊西（Cricy）之戰爭。考據家謂其術傳自東方中國。西洋人得其術雖遲，而鑄造發達改良，則較中國爲速。中國人得一法，死守不變。政府重文人，輕百工。社會亦以爲尙。對於發明人絕無奬勵鼓舞之事。故發明人死後，其術卽絕。他人無從爲之改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抵印度洋沿岸及斐律賓羣島，其能戰勝各國，征服土人，全賴火器之功。據西史所載，南洋各國當時亦有礮。但射程遠遜歐人。馬雷人礮彈不能達歐人，而歐人自船上所發之礮能破毀馬雷人之礮台。是以所至無敵。明末中國礮銃之落後，亦不下馬雷人。不與歐人衝突則已，一有衝突，無不敗衂。明人亦知其然。正德時，葡船至廣東白沙，巡檢何儒得其制。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

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所擊輒糜碎。嘉靖八年（西一五二九年）始從右都御史汪鋐言，造法郎機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其後荷蘭人至，其礮更大，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聲震數十里。萬曆二十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寇朝鮮。明兵禦之，得力於礮銃者不少。滿洲兵起，礮銃亦多所利用。清太祖奴兒哈赤卽在甯遠城下，為袁崇煥自葡國輸入之巨礮所擊傷而致死也。時葡人在澳門立鑄礮廠一所，可造各種鋼鐵礮。天啟二年，明廷遣使至澳門，命耶穌會士羅如望 (Joannes de Rocha)，陽瑪諾 (Emmanuel Diaz)，龍華民 (N. Longobardi)，等製造銃礮。次年召用艾儒略（Julius Aleni），畢方濟（G. Sambiaso）等。於是至者，不僅教士，卽凡在澳門之外人，俱隨之而來。或製造武器，或馳驅疆場。崇禎十二年畢方濟上疏，有云『臣蒿目時艱，思所以恢復封疆，而裨益國家者。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二曰辨礦脈以裕軍需。三曰通西商以官海利。四曰購西銃以資戰守。蓋造化之利，發現於礦。第不知脈苗之所在，則妄鑿一日，卽虛一日之費。西國格物窮理之書，凡天文、地理、農政、水法、火攻等器，無不具載。其論五金之礦脈，徵兆多端。宜往澳門聘招精於礦路之儒，繙譯中文，循脈而細察之，

庶能左右逢源。廣東之澳門商人，設店貿易。納稅已經百年。偶因牙儈之爭端，遂阻進省之貿易。宜照舊令其進省，以充國用。西銃之所以可用者，因其鋼鐵皆經百鍊，純粹無滓。故爲精工也。天啓元年，邊疆不靖。從兵部奏請，准購用西銃，募用西兵。以此臣輩陸若漢(Johannes Rodriquez)等二十四人進銃四尊。緩急擊敵，屢著奇功。更乞敕從澳門，聘招熟於製銃之西士數人。使授以製藥點放之術，摧鋒破敵之奇。併使精於推曆之西士數人，襄助曆局之事務。』云。此疏卽上，明廷因東北患急，遂傾信其言。然明廷政治腐敗，人心瓦解，雖有利器，不足以救亡，反以資敵也。清室入主中國，敎士又助清室鑄造銃礮。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叛，比國敎士南懷仁 (F. Verbiest) 於二三年間，共鑄大小鐵礮百二十門，分配於陝西、湖廣、江西等省。二十年，更鑄輕便歐式之神武礮三百二十門。在盧溝橋試放。帝親莅閱。大加賞賜。又編神武圖說一書。中分理論二十六圖解四十四。說明銃礮之詳細而進呈於帝。遂賜以工部右侍郎之職銜。西洋銃礮之銳利，有明末清初之試驗，中國人似宜深知之而自已學習鑄造，或更改良精益求精，殊可青勝於藍矣。乃事有大謬不然者，以前所得之經驗，不久卽忘於九天之外。中國大部軍隊所用之軍器，仍不外弓矢刀矛諸物。直至清末，中

日戰爭時，西國鎗礮，尙未盡能驅弓矢刀矛而代之也。「百工小技」之錯誤觀念，深中於人心。雖至今猶然也。道光時，鴉片戰爭，中國軍隊銃礮不如人，亦爲失敗一大原因。咸豐間洪楊盤據江浙。李鴻章利用外洋輸入火器，攻下蘇常。於是曾國藩等於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在上海立江南製造廠，製造鎗礮，並附設兵工學校，培養兵工人才，翻譯西國科學書籍，灌輸外國智識。與江南製造局同時設立者，又有南京機器局。董其事者，爲英國人馬戛爾特尼（Macartney）。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福州兵工廠成立。主其事者，爲法國人基克爾（M. Giquel）。以後廣州、成都、杭州、漢陽、德州、西安、濟南、迪化、雲南各地，皆有兵工廠。然皆規模狹小，每日製造數萬粒子彈，數十支鎗而已。入民國後，又有鞏縣、太原、奉天、三兵工廠。規模略大。然較之歐美，不過小巫比大巫耳。各兵工廠所用原料，亦皆來自外國，本國不能自給也。歐美最近之軍器，幾於無人過問。國家自強，最要之兵工製造廠，忽略乃至如此。希望不爲強鄰所蹂躪，豈可得哉？

（參觀明史；續文獻通考；稻葉君山清朝全史；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第二節　學術事業

曆法改良　曆為中國自古要政。堯時嘗命羲和主治曆象。定一歲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自是以後，歷代以奉正朔為天下臣服之表示。國中農桑庶務皆依曆得成。於是製定曆法，為最要之政。而中國古人以儀器及測量算計之不精，由上古迄明末，中間四千年，曆法迄未能製得精密，長久不變。每閱百餘年，則節候乖戾，交食不驗，必須修改。元時西域嘛塔把曆法輸入中國。故在燕京，同時有中國欽天監，及回回欽天監。其法較中國為密。同時中國天文家郭守敬修訂前法，亦最精密。明太祖時作大統曆，亦參用回回法。至明末復多疏舛，日食有謬，回回曆算法，仍有不精之點也。

曆者記一年之中，時光節候之次序，長短，詳細分劃。俾各種天象，如日蝕，月蝕，或夏至，冬至，皆能於預定時日，測知之也。若不能預知，或測定而不驗，則失曆之功用，其曆必有錯誤而須修改也。曆所依據之時候，根本有三種：一為日，二為月，三為年。日者，地球於若干時內，自轉一週。此為最短之時候。太陽出，則人與禽獸皆醒而動作。日入，則就寢休息。一日之長短有定。雖最精之天文儀器，未能測得有何變化也。因其固定，故天文家取之以為單位。月者，最初本為太陰，繞地球一週，所需

之時候。年者，地球繞太陽一週，所需之時候也。設使一月所含之天數，爲一整數，而一年所含之月數，亦爲一整數，則曆自易定。不需歷代名家勞神費力，測驗計算，修改而復修改，至今尙未能一決而永遠不變，歷代史亦可不必有天文志矣。但太陰繞地球，與地球繞太陽，其時間關係，並無一定整數之比例。故從古至今，各國各民族，皆有無數名人，用盡心思，求一方法，以除去此困難也。上古草昧之世，溫寒兩帶居人所最先感覺者，卽四季氣候變遷之有一定時日也。但用氣候變遷，以確定一年之長短，最不易爲，且不能確。故古人不能不求助於天文觀察與測驗。最簡之天文觀察，卽四季氣候變遷，與太陽在天空所經之方位角度有關係。卽在天空萬千星中，太陽每年自繞其軌道（黃道）一週。周而復始也。第二觀察，卽每季當日出或日落時，各有一定星辰，出於天空。因之發生兩種方法，以量一年之長短：一爲測定太陽經過赤道之時間，卽此次春分，或秋分距下次春分，或秋分之時間（或用兩次夏至，兩次冬至之時間亦可；）二爲測定某星辰再現一定方位之時間。第一法測定者爲赤道年(Equinoctial year)；第二法測定者爲星年(Sidereal year)。二者所得，略有不同。赤道年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星年爲三百六十五日六時

九分九秒。均數約爲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之一($365\frac{1}{4}$ days)。此卽地球繞太陽一週所需之時候，又曰太陽年(Solar year)者也。太陰繞地球一週，卽兩次新月中間時候，確數爲二九·五三〇五八天數，約爲二十九日半($29\frac{1}{2}$ days)。亦曰太陰月(Lunar-month)。此數之最近整數爲三十。新月發現十二次，所需時候約爲三百六十日。較之地球繞太陽所需時日，僅缺五天半耳。故自古以來各國各民族，皆以十二月爲一年也。所欠缺之數，各國各民族，用各種方法補足之。有設法更換一月之長短者。又有變更一年之長短者。亦有將所缺乏天數，加在年終者。所難者，日、月、年、三種時候之眞確長短，無一共同之除數，可使日數化成月數或年數，或由月數再成年數，無餘數也。含餘數不計，一年之間，固無多大錯誤。但若積之數十年或百餘年，則所差之數甚多。節候自然乖戾，交食自然不驗矣。各民族多取一長週期，數年或十餘年，使其日月二數之比例，成一整數。置若干大月與小月以調劑之。古代希臘人取二百三十五月爲一週數。此中有一百二十五月爲大月。每大月有三十日。一百十月爲小月。每小月有二十九日。依此推算二百三十五月，共有六千九百四十日數。二百三十五次新月所需眞確時間爲 $235\times29{\cdot}53058=6939{\cdot}688$ 天數。此一週期

之日數，較之所眞需者約少三分之一日。積七十年則少一全日。回回教徒取三百六十月爲一週期。此中有大月一百九十一，小月一百六十九。大月小月輪流配置。第一月三十日，第十二月二十九日。一週期之日數，共一萬六百三十一。三百六十次新月所需日數爲 10631·0116。所差之數，積八十七週期，或二千六百十年，始缺一全日。至期將第十二月加一日成爲三十日。回回人之發明，較之希臘人優多矣。古代中國人所用者，爲太陽太陰合曆 (Luni-Solar year)。以天體周圍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

朔虛，而閏生焉。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羅馬之儒略曆全以太陽作準。每四年爲一週。三年有三百六十五日。第四年有三百六十六日。堯典所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卽此也。耶穌降生前四百三十三年（周考王八年），希臘人梅通(Meton) 發明六千九百四十日爲一週期，可以分作二百三十五太陰月(Lunar Month)，同時又可分作十九太陽年(Solar year)。此二百三十五太陰月中，一百二十五爲大月：月三十日。一百十月爲小月：月二十九日。總共凡六千九百四十日。其與太陽年之比較，可於下表見之。

	日數	小時	分
235 次新月需時	6939	16	31
19 儒略年需時	6939	18	0
19 眞正太陽年需時	6939	14	27

由此表觀之，6940日之週期，較之確數略長數小時。二百三十五次新月所需時候，較之儒略曆十九年，每年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之一者略少。較之眞正太陽年則略大。再次則將二百三十五太陰月分作十九年。其中有十二短年。每年有十二月。七長年，每年有十三月。其有十三月之長

年，大概爲第三，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及第十九等年。其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等年則皆短年也。大月小月輪流配置。惟每閱二三年須將小月減一而換以大月，俾於一週期內有大月一百二十五，小月一百十也。梅通所發明之週期，六千九百四十日，較之二百三十五太陰月，或十九太陽年，皆略長數小時。後又有喀里勃斯（Callypus）者略加修改，以求更密。乃於每四週期後，刪去一日。四週期合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分爲九百四十月，七十六年。此即儒略年（Julian year）也。七十六年後，新月發現，始有六小時之錯誤。喀氏若自第三週期，某年某月，刪去一日，則更近確情矣。

利瑪竇居北京時，深知曆法與中國政治之重要關係。致書歐洲耶穌會，請派一最良天文家來中國，俾以後助中國政府修改曆法。耶穌會乃遣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東來。在一千六百零六年（萬曆三十四年）抵北京。西洋各國適於一千五百八十二年（萬曆十年）時，廢古代儒略舊曆（Julian calendar）而採用格里高雷（Gregory XIII）新曆。新曆較舊曆提早十日。依舊曆每世紀之末一年，如耶穌降生後一千六百年，一千七百年等皆爲閏年，但依新

曆僅世紀之次數用四可除淨者，得爲閏年。例如一千六百年爲閏年，而一千七百年，一千八百年，一千九百年皆不得爲閏年。歐洲南部奉天主教諸國，皆卽採用新曆。北部新教國家，則良久始漸漸用之。以前歐洲人，新年不必起始於一月一號。儒略曆行用幾達一千六百年之久。其間各地政府，或教會主教，對於新年元旦日，竟無一定日期。最普通之元旦爲三月一號，及三月二十二號。後一日期乃春分日也。但後此不久，採用一月一號者日漸其多。至一千七百五十二年（乾隆十七年）英國亦採用新曆。一月一號爲新年元旦日，始普遍世界矣。俄羅斯人拒用新曆最久。直至大革命後，始廢舊曆而與西歐一致矣。明末歐洲天文家，經多年之討論與訓練，其計曆之法，始確較中國爲優。萬曆三十九年（西一六一一年），欽天監回回曆官誤測日食。明廷乃下詔，以西洋人管理欽天監，修改曆法。有清一代所行之曆，卽參酌歐西之法而成者也。自此以後，欽天監修曆爲耶穌會傳教師之大本營。上可交接中國政府官吏君主，下可爲傳教師之總機關。萬曆四十四年（西一六一六年）至崇禎二年（西一六一九年），因各種理由，明廷復不用耶穌會士。但崇禎二年（西一六二九年）後，直至清康熙三年，（西一六六四年）欽天監復歸耶穌會士掌理。鄧

玉函(Terrentius)，湯若望(Schall)皆此時期中之著名欽天監正也。明史卷三二六意大里亞傳記：『崇禎時曆法益疏舛。禮部尚書徐光啓請令其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卽以崇禎元年戊辰爲曆元。名之曰崇禎曆書。雖未頒行，其法視大統曆爲密。識者有取焉。』入淸，湯若望仍得淸順治帝之信任，爲監副。康熙三年至八年，因中國官憲排擠之故，耶穌會人出欽天監。但八年時，康熙帝使比國耶穌會士南懷仁(Verbiest)與中國人楊光先、吳明煊同測驗日影。以試中西法之優劣。南懷仁得勝。於是淸帝復其位。欽天監復歸耶穌會士。直至道光十八年(西一八三八年)始廢西洋闕。入民國則更廢陰曆，而逕行用格里高雷曆矣。

(參觀 Y. G.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K. S. Latourett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Simon Newcomb's Astronomy; 書經堯典蔡注；元史天文志曆志；明史曆志。)

本國地圖之測繪　中國有輿圖甚早。周禮大司馬，掌圖之官，有司險與職方氏。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

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古人對於輿圖，慎重可知。漢高入咸陽，蕭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高因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輿圖之要可知。以後歷朝皆有圖志。而流傳至今者甚少。今代所留最古之圖有僞齊阜昌時所刻賈耽禹跡圖在濟南蘇州文廟所存石刻南宋淳祐地理圖。海國圖志轉錄明永樂大典之元代西北三藩圖，明萬曆時九邊圖。此外又有元明時代所留志書附圖。所有以前中國舊圖，皆未經準確測量，繪製粗劣，尺寸比例，漫無比較。故各圖皆不精確，不過略示其大概而已。清康熙帝廿八年，尼布楚締約以後，教士張誠（Gerbillon）以亞洲地圖進帝。說明滿洲地理知識之缺乏。以後數次征撫蒙古，遊歷滿洲，及巡幸江南，皆命張誠隨行。隨地測定緯度。是時帝已有測量全國之計劃。至四十七年（西一七〇八年）四月十六日，乃明令測圖，實行工作。由白進（Bouvet），雷孝思（Regis），杜德美（Tuatoux）諸神父先從長城測起。閱二月，白進病，其餘二人繼續工作。至一千七百零九年一月十日，返北京。繪成一圖。凡長城之各門各堡以及其附近之城寨，河谷、水

流、均行繪入。北直隸之測量，於一千七百零七年十二月十日開始。至一千七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完工。一千七百零九年（康熙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雷孝思、杜德美、費隱（Fridulli）諸人，開始測量滿洲。先從遼東入手，東南至朝鮮邊境圖們江，東北至花松江之魚皮韃子區域。一千七百十年七月二十二日，進至黑龍江省。十二月十四日圖成。一千七百十一年（康熙五十年）添人工作，分爲二隊。雷孝思、加爾特（Cardols）二人往山東。杜德美、費隱、潘如（Bonjour），湯尙賢(de Tarte)四人出長城至哈密，測定喀爾喀蒙古之地。歸由陝西山西而返。一千七百十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回北京。又命加而特、湯尙賢(de Tarte)同往山陝（時甘肅未分省）二省。圖成，湯尙賢講解於帝。帝大悅。雷孝思、馮秉正（de Mailla），及德瑪諾（Kenderer）三人測繪河南、江南、浙江、福建。湯尙賢，加爾特二人合測江西、廣東、及廣西。費隱、潘如測繪四川、雲南。潘如因勞死於雲南。一千七百十四年（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費隱亦病。乃於一千七百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又派雷孝思赴滇，同測雲南、貴州及湖廣之圖。一千七百十七年（康熙五十六年）一月一日，全功告成，返京。白進彙成總圖一張，各省分圖一張。康熙五十七年進呈。於是關內十五省，

及關外滿蒙各地，皆經測量成圖。為中國自古未有之大功。自康熙四十七年始功，至五十五年竣事。五十七年，而全圖繪畢。帝名之曰皇輿全覽圖。迄今為中國各種地圖之最要根據。同治二年，武昌府刊印之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及現今坊間所售之各種圖，皆不能出乎此圖之上也。當時所用測量方法為三角網法。中國人以前所未知也。

（參考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見地學雜誌十九年三期）Coul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西國醫學之傳入　中國醫藥之學，發明甚古。古代名醫，史不絕書。醫藥書籍，汗牛充棟。然好泥古不變，進步遲緩。解剖學知識尤為缺乏。傳布機關全無。海內良醫有發明新療養法，新丹方者，大抵嚴守祕密，傳子傳孫，不傳他人。失醫為仁術之意矣。古代西國醫學，較之中國，孰優孰劣，誠不易言。但十九世紀以來，各種麻醉藥，殺菌藥之發明，愛格斯（X）光線及雷錠（Radium）之施用，使病人痛苦減輕，傳染病可以預防，體內疾病，可以手術割去，醫療種種進步，騰飛直上，一日千里。中醫與之相較，眞不啻牛車騾車與汽車飛機之比矣。醫術可以減輕病人痛苦，得人歡心，除祛隔閡，教士似深知之。古代景教徒在阿拉伯帝國之得以興旺者，擅長岐黃術，亦其一因也。醫院藥房，

醫治身體之外，尚可醫治靈魂也。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曾否努力輸入西洋醫學，無記載可考。路德新教徒入中國後，西洋醫術始傳入中國。最早者爲種痘法。有謂爲西班牙人於一千八百零三年（清嘉慶八年）傳入中國者。據確實記載，則英國東印度公司醫官皮爾孫（Alexander Pearson）於一千八百零五年（嘉慶十年）傳種痘法於中國。皮爾孫在廣州行醫。曾著一小書，說明種痘法，斯當頓（George Staunton）代爲譯成華文。氏又傳授其法於中國生徒。最要者爲海官（Hequa）。海官以後成爲名醫。三十年間爲人種痘，達一百萬口。海官傳此法於其子。在他處設立醫院，專爲人種痘。一千八百二十年時（嘉慶二十五年），東印度公司外科醫生立溫斯敦（Livingstone）與瑪禮孫在澳門，立一小醫院，醫治貧苦中國人。有中國生徒襄助其事。一千八百二十七年（道光七年）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T. R. Colledge）在澳門立一眼科醫院。翌年又立一養病院，可容四十人。五年間入院受醫者達四千餘人。捐款維持者，東印度公司職員外，中國大行商人亦皆踴躍輸將。此爲第一西國醫院，立於中國境內也。再次年，郭雷樞在廣州，又立一小醫院。中外人皆可受治。延白拉福（J. A. Bradford）及柯克司（Cox）兩醫士襄

理其事。郭雷樞著一論文，題曰任用醫士在中國傳教商榷書(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此文在美國頗引起一般人之注意。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時(道光十四年)，美國人派克(Peter Parker)先在新加坡立一醫院，專爲中國僑民。翌年移醫院於廣州，專理眼科。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與美國公理會士裨治文(Rev E. C. Bridgman)及郭雷樞，共組廣州醫科傳教會（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派克於一千八百四十四年（道光二十四年）充美國使館參贊，代理公使，後爲正式全權公使。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離中國，回美國。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同治八年）在美國充駐華醫科傳教會會長。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光緒十四年）卒於美國。氏爲在中國教士兼醫生之第一人。次於氏者爲英國人羅克哈忒（William Lockhart）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抵廣州。翌年，充派克在澳門所立之醫院院長。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抵上海，立英租界山東路之醫院。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在北京立一醫院，卽以後協和醫院之基礎也。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英國人霍布孫（Benja-

min Hobson）抵廣州，充澳門醫院院長。後往香港，充倫敦傳教會醫院院長。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抵上海，充山東路醫院院長。自是以後，醫生兼教士來華者日多。各地西式醫院，亦逐漸設立。初立時多遭愚民反對。甚有謂外國人挖取小孩心眼以製藥者。久之漸得中國人民信仰。外國醫術，優於中國舊有，逐漸證明。外國醫院，組織完美，尤優於中國之無組織者多矣。外國醫術在中國減輕人民痛苦，救免夭亡。同時中國人反對基督教之偏見亦漸消除。當初醫科傳教會設立之目的，亦可謂遠矣。各醫院之功績，不獨爲人治愈疾病，減小死亡率，而訓練甚多中國助手，翻譯西國醫學書籍爲漢文，傳布西國醫學知識於中國，其功亦不小也。今全國教會設立之醫院，數目與物質兩方，皆較中國自己公私設立者，多而且備。各省著名之教會醫院，有如汕頭英國長老會之醫院，奉天蘇格蘭聯合自由會之醫院，杭州大英醫院、漢口英國醫院、上海倫敦傳教會醫院、美國聖公會醫院、濟南齊魯醫院、淮陰仁濟醫院、北京協和醫院等，皆資本雄厚，規模極大，馳名全國。每年活人無數。使中國醫學，日漸歐化。現在雖尚有人持西醫不如中醫，或西醫長於外科，短於內科諸說。但日久以後，西醫自必戰勝中醫也。教會醫院，林立於中國內地，對於傳布西國醫學

知識，固爲有益，但亦有害。彼人資本雄厚，名譽久著，使中國學西醫者，初入世懸壺，不能與之競爭。社會尊視外國醫生心理太過。本國之西醫無人問津，不得不改操他業者有之矣。西人存心競爭，不使中國人能操此高尚職業歟？抑中國之習西醫者無恆心，無毅力，陞官發財之念熾於安分守職之心，宜力社會，財產徐集，不若作官一日，不勞而獲，腰纏萬金，騎鶴升天之爲樂歟？

（參觀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第三節　財政事業

海關之設立　吾國海上與南洋及印度洋西岸諸國來往通商，兩漢時代已然矣。是後歷吳、晉、宋、齊、梁、陳、隋各朝，交通未嘗斷絕。然設關收稅，則唐代始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百三十云：「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爲市，稍收利入官。……貞觀十七年（西六四三年）詔三路市舶司，番商販到龍腦、沈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分。」市舶司，卽今之海關也。宋襲唐制，對海外通商，更爲注意。太宗雍熙四年，遣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南宋初年，版圖縮小，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高宗嘗言：「市舶之利最厚。若

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寬民力爾。」又諭「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宋代通商口岸有廣州、泉州、明州、秀州、密州板橋（今膠州。）較之唐代略增。北方遼國邊界，鎮、易、雄、霸、滄、等州，各置榷貨務，以掌兩國交易。元亦有市舶司之設。細貨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商埠爲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東、杭州、慶元、凡七處。明初市舶司僅設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三地。明末，增設澳門爲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各國通商之地。唐宋元明時代，政府雖在各埠立有抽稅定章，但管理人多不照章而行，另加種種苛捐，使外商不能忍受，致暴動者有之矣。清初，鄭成功擾亂沿海，故海禁甚嚴，不許商船出海。康熙二十三年（西一六八四年）海外平定，臺澎設兵，乃開各省海禁。以荷蘭助討鄭氏有功，首許互市。設粵海關於廣州之澳門，閩海關於福建之漳州，浙海關於浙江之寧波，江海關於江南之雲台山（在鎮江西門外。）署使涖之。各徵其稅。二十八年，議定江浙閩廣四省海關徵稅之例。每關各差一員，管理稅務。此海關之名，所由來也。顧雖有徵稅章程，而吏治腐敗，誅求無厭，貪婪橫暴，無所不至。正稅以外，有所謂規費，支銷或歸公充餉名目。而司事巡役人等，又有規禮、火足、

開倉、驗倉、放倉、押船、貼寫、小包之名目，以資中飽。商民極爲困難。乾隆五十八年（西一七九三）英國特遣使臣馬戛爾尼（Macartney）至北京與中國政府磋商訂一規定稅則。不得要領。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又遣阿美斯德（Amherst）來北京。復失敗。時英國商業最盛，損失最多。兩次遣使，皆無結果。因之與中國感情乖離，趨於極點。至道光二十年（西一八四〇）乃激成鴉片之戰。二十二年，江寗條約開廣東、廈門、福州、寗波、上海五口通商。賠款二千一百萬兩。以海關稅充擔保。因此英國得派貿易監督官及領事館員於各口岸，以監視我國對於其國商人所徵之出入貨稅，及其他諸稅鈔之適當與否。自唐以來，我國自由設關徵稅之制，至是破壞盡矣。因此我國政府對於各關稅率，乃負一種公平課稅之義務。且從外人之希望，有另設新關之必要。於是改原有之海關爲常關。由新條約所發生者，稱曰新關。同時法美等國亦步英國之後塵，均於道光二十四年，與我國結同等之條約。各派領事駐各口岸，以保護本國商人。而內外商品之輸出輸入，皆由各國領事徵收稅餉，再由領事繳交於我國收稅官吏。此爲外國領事代理徵收關稅時代。然各國領事各相其自國商人任意減收貨稅，勢所不免。以致稅收，不能發達。咸豐元年（西一八五一）政府遂

與各國交涉，得改領事代理徵稅制度爲國家直接徵稅制度。然我國官吏，又苦無新關辦事之經驗，且多貪枉者流。營私舞弊，不顧大局，遂惹起外商之愁訴。各國駐京公使屢有煩言。遂建議欲救此弊，須立一徵收機關，保存中國主權，但同時須用西國方法與訓練。欲達此目的，非雇用西人不可。政府亦恐本國官吏不諳外貨價値，或難勝任。遂容其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咸豐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英美法三國領事與上海道吳健彰會議，訂立新關制度八條。始於各通商口岸，委用各國前所派之稅務監督官，爲稅務司，專司海關稅務。英美法三國領事，各舉一稅務司（Inspector），權利同等。以上海海關稅務監督局從新改組。三稅務司，一爲英國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次爲美國人喀爾（Lewis Carr），三爲法國人斯密司（Arthur Smith）。三人同時各在其領事前宣誓云：『願以忠誠盡稅務司之職，恪遵吳道太及三國領事會議所定諸條款。求上帝助余。』各領事助中國政府尋覓相當人材，而主權與責任，則掌之中國人手中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三人皆辭職。繼威妥瑪者爲李泰國（Horatio N. Lay），繼斯密司者爲愛丹（Edan），繼喀爾者爲費胥（Fish）。上海稅務如是管理者，直至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是年

天津條約規定各口海關，皆須雇用外國人爲稅務司。翌年，中國政府任命李泰國爲總稅務司(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立總稅務處於北京。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十一月，李泰國因與中國政府意見相左，罷職。繼其位者爲赫德(Sir Robert Hart)。赫德充中國總稅務司之職四十五年。至一千九百零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因病回英國，代之者爲白萊敦(R. E. Bredon)。一千九百十年白萊敦辭，代之者爲安格聯(F. A. Aglen)。一千九百十一年（宣統三年）九月，赫德死而安乃實任。赫德之名爲中國海關一大紀念。各種組織皆由彼成之。使中國海關，有近代歐洲式者彼之功也。但中國海關稅多半不能自主。直至前數年，始修改條約，自由徵稅也。

（參觀拙作中西交通史料匯篇；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黃序鵷海關通志；籌辦夷務始末；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銀行　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徵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故價。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

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泉府所司，與今之銀行職務已相同矣。後代斯業，無若何發展。至於合資公司性質之銀行，則無有也。政府亦無一定章程，管理各銀行。西法本輸入之先，全國銀行皆爲山西之錢莊票號，專以存放匯劃爲業。略與今之商業銀行相近。其信用亦甚昭著。辛亥革命，全國金融大恐慌。山西票莊，遭大打擊。加以其人不能順應潮流，改舊法而從泰西銀行新法。於是一蹶不振。至今日而幾於無人掛齒矣。咸同以後，戶部以軍需孔急，度支告匱，於京城內外，招商設立官銀錢號。由庫發給成本銀兩，並戶工兩局交庫卯錢，爲推行銀錢票之關鍵。光緒末年，直、奉、吉、黑、魯、豫、晉、蘇、贛、閩、浙、鄂、湘、秦、隴、川、粵、桂、熱河等處，先後設立官銀錢局，或爲兌換銅元之機關，或爲發行鈔票之樞紐。收存公款，稍含國家分銀行之性質。時變日急，西法日入。官私銀行，日漸增多。度支部，始有銀行則例之頒行。入民國，與時通變。銀行學人才日多。銀行法規，由粗簡而漸達精密。以掌理金庫，發行鈔票爲主。而並及其他之營業。於是有國家銀行之制，以輔助政府事業爲務。光緒三十年春，戶部奏請由部試辦銀行，以爲推行幣制之樞紐。詔可之。是年三月，奏定試辦銀行章程三十二條。是爲創設銀行之始。三十四年正月，度支部奏定大清銀行則例二十四條。略謂國家銀行，由國家飭

令設立。與以特權。凡通用國幣，發行紙幣，管理官款出入，擔任緊要公債，皆有應盡之義務。戶部銀行，卽爲中央銀行。現在戶部已改稱度支部。擬改銀行之名曰大淸銀行。自是大淸銀行遂認爲國家銀行矣。股本一千萬兩。分爲十萬股。總行設北京，其餘沿江沿海貿易繁盛之處，以及各省府廳州縣，皆設分行分號。關於發行紙幣經理國庫，流通新幣等項，規定尤詳。與各國國家銀行之章制略同。各地多設分行，但不久弊竇叢生。行員濫放款項，冀得年終紅利爲分肥之需。放出者，多無着落。以致牽動各地金融，累及銀行信用。辛亥變起，大淸銀行倒閉。民國初元，金融全權，操諸外人之手。財政部乃籌設中央銀行爲發行紙幣，統一國庫之樞紐。擬訂中國銀行則例三十條。二年四月，經參議院議決公布。採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但恐招股遲延成立時期，乃由政府認墊股本。並擬出三分之一以上，卽行開辦。一面招集商股，逐漸擴充。初定股本總額爲六千萬元。分爲六十萬股，每股銀元一百元。政府先行認墊三十萬股。餘數由人民認購。認購總額超過三十萬股時，得由政府察酌情形，將認墊股份，分期宣布，售與人民。中國銀行開辦以後，營業甚爲發達。全國之中合計總管理處，分行、分號、匯兌所、支所、兌換所共一百八十七處。每年淨利甚多。尤以民國初年爲巨。國家

銀行以外，尙有特種銀行，如交通銀行、殖邊銀行、農商銀行、邊業銀行、勸業銀行、蒙藏銀行、財政部平市官錢局等。民國以來，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亦皆營業甚旺。通商大埠多有分行。此類銀行有半官性質。亦得管理金庫。第三類，爲普通商業銀行，完全商股，不理金庫。其中有在清季即經政府核准發行鈔票者。如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四明商業銀行、北洋保商銀行是也。有在民國得發行鈔票權者，如中國實業銀行、中南銀行、大中銀行、山東銀行是也。第四類，爲地方銀行。爲各省政府所立。辦理多不妥善。濫發紙幣，信用甚薄。此類銀行起自清咸豐二年。國家以財用匱乏，餉需孔亟，於北京城內外招商設立官銀錢號，以爲推行銀錢票之關鍵。迨光緒季年，各省之有官銀錢局者，已有直、魯、吉、黑、豫、晉、蘇、贛、閩、浙、鄂、湘、秦、隴、川、粵、桂、熱河等十餘省區。自是一省之中，有設一機關者，有設數機關者。大都爲各省省庫之金融機關。發行銀元、銀兩、銅元、或制錢鈔票。未經中央法令明定本位單位，紛雜不一。視各省之需要而異。準備之有無，以及成數之若干，亦復各自爲制。票之兌現，亦不一致。信用之良否，市價之高下，亦復互異。後有改爲新式銀行者，其發行鈔票之權，依然存在。各省長官以財政艱窘，無由取給，悉以發行紙幣爲籌款之一法。以致濫發無藝。民國

以來，中央財政部曾數次設法整理，限制發票。但法令多未能實行。此類銀行，成立最早，而在歐化式之銀行中亦最落伍。近年以來，吾國各種銀行事業，日漸發達。辦理日益完善。加以外國銀行如中法實業銀行、中華匯業銀行、道勝銀行、華威銀行、中華懋業銀行等之歇業，外商信用亦不足恃。於是本國銀行日益興旺。華商銀行鈔票之勢力，已超外商銀行之上矣。（參觀賈士毅民國財政史；張家驤中華幣制史；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on Banks.）

幣制　上古草昧之世，立市廛，日中爲市，以通有無。以物易物，無所謂貨幣也。稍進，則珠、玉、龜、貝、五金、布、帛、皆作爲錢幣。周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錢法之端緒始開。春秋戰國之世，流通最廣者爲錢、鎛、（又曰布）刀三種。此時可稱刀布時代。秦併六國，統一天下。禁用珠玉龜貝銀錫之屬。分幣爲二等。黃金以鎰計，爲上幣。以銅鑄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自此專以金類爲貨幣。漢承秦後，先鑄莢錢。物價騰踴，米石萬錢。武帝建元五年，鑄五銖錢。輕重適中，民皆便之。自漢迄隋，中間錢幣興革雖多，要以五銖錢行之最久。可稱此時期爲五銖錢時代。隋朝禁用古錢及私鑄。僅許用五銖錢。隋之五銖錢，與漢之五銖

錢，其文微異。錢幣始歸統一。民以爲便。唐高祖卽位，乃廢舊錢，鑄開元通寶。每錢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是爲有通寶錢之始。自唐初以迄五代之末，所鑄錢文，均以通寶爲名。故可稱此時期爲第一通寶錢時代。宋遼金元明清各朝鑄錢，皆按年號。而通寶二字不換。此可稱爲第二通寶錢時代。自秦代半兩錢以及後代五銖通寶各錢，皆用銅或鐵，而中有方孔。從未用銀或黃金鑄錢也。此爲完全舊時代之中國幣制也。光緒二十六年（西一九〇〇年），兩廣總督李鴻章見英仙士銅錢，質輕而值大。謀仿鑄之。奏請設局先行試鑄。是爲中國鑄造銅元之始；亦卽中國無孔錢之始。其所鑄之錢，每枚當制錢十文。以紫銅九十五分，白鉛四分，點錫一分配合。每枚重量二錢。一面鐫光緒元寶四字。內加清文廣寶二字。周圍鐫廣東省造。並分鐫每百枚換一圓字樣。他面中鐫蟠龍紋，周圍英文，譯曰廣東一仙。二十七年以制錢缺少，不敷周轉，而銅元行於廣東已具成效，乃諭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於是各省大鑄銅元。銅元代制錢之用。初出無多。社會歡迎。惜當時清廷不深知貨幣原理。對於銅元鑄數之限制，及銀銅間比價之確定，金融兌換機關之設置，如何籌畫，毫未顧及。以後各省督撫大吏，莫不藉銅元餘利，以爲興辦地方新政之用。競相鑄造，各立門戶。初

宋嘗有整理幣制之意。卒至銅元充斥市面。價值日落。物價昂貴。此省銅元，他省不用。幣制因之大起紊亂。民國以來，各省更各自爲政。四川省鑄黃銅當伍十，當百大銅元。尤爲剝削人民，淆亂幣制。初以新幣便民者，至此反以害民。以前有孔制錢，通行全國者，日漸減少。沿江沿海各省，幾於不可見矣。幣制中多此歐化式之銅元，其利甚微。而二三十年間，將人民生活費用，抬高十倍有餘。小民生計維艱。多此反不若無此之爲愈也。此亦不審愼輸入歐化之一例也。

銅元之外，近年以來，又增鑄銀元。銀元亦仿歐洲鏤幣鑄成。我國古代無銀元也。銀爲白金。自古以來卽用之。其形式不一。或鑄成餅形，因名曰餅，又稱爲鋌，或鈑，或笏或版。自宋以後，通稱爲錠。俗名曰元寶。形如馬蹄。錠之鑄造，皆隨民便。非若銅錢專屬之國家事業也。其成分，重量、大小、各地互異。近年銀元雖盛行以代銀兩之用，但在通商大埠，買賣交易，仍有以銀爲標準者。外商銀行亦以銀兩爲本位。直至今年（民國二十二年）中央財政部始廢兩改元。銀元本位得以確立。考外國銀元流通中國，約當淸代乾隆嘉慶兩朝。初稱曰番餅，繼稱曰洋錢。乾隆九年，范廷楷奏稱：「內地姦商，私帶制錢出海與諸番交易。以數十文易番銀一元。獲利最重。返舶之時，或帶番餅或帶洋

貨。」嘉慶十九年，蔣攸銛奏稱：「洋錢進口，民間以其使用簡便，頗覺流通。每年夷船帶來之洋錢或二三百萬元，或四五百萬元，亦有數十萬元者不等。」銀錢稱元，始見於此。我國商人以其衡色齊等，便於交易，多樂用之。故不數十年，徧行江浙閩粵各口，更深及內地。將元寶擠滅矣。粵、桂、湘、贛、使用爛板。江浙則用光面。外國銀元輸入者有數種。最早者為西班牙洋，又號本洋。明末時已流入中國，安徽蕪湖一帶，至今尚行用之。次有鷹洋，為墨西哥獨立後所鑄造之銀幣。因幣面花紋有鷹鳥而得名。俗又稱曰英洋，蓋誤鷹為英也。外國銀幣輸入我國者，以此種為最多數。其通行最廣之區域，為吾國南部及中部地方。如上海一地，幾以此為主幣。民國八年以前，上海外國銀行發行之紙幣，皆以此為兌換準備。近年以來，輸出之數，超過輸入及國內之銷燬等。該項銀幣之流通數量，逐日形減少。民國八年，英龍洋（本國幣因幣面花紋有龍故得名。）行市統一，商民特種愛好，早已失去矣。再次則為人洋，又呼站人，又曰香洋，又曰杖洋。因幣面花紋有人持杖站立，故得種種之名也。此幣為香港造幣局所造，行於粵及平津。近年以來，市面不多見矣。日本龍洋，因幣面花紋有龍，故得名。通行於閩省，近亦稀見。安南洋乃法屬安南所造，行於滇桂兩省邊地。美國銀元亦曾流

入，但爲數至微。道光初年，各國銀錢輸入漸多，蔓延各地，欲禁無由。兩廣總督林則徐奏請自行鼓鑄銀元，藉資抵制。旋經部議駁。道光中，浙省曾自鑄一兩重銀錢，欲與洋元並行。以民間阻滯而止。光緒十三年二月，粤督張之洞奏稱廣東通省皆用外洋銀錢，波及廣西至於閩、浙、皖、鄂。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四川、前後藏、無不通行。以致漏巵無底。粤省擬試造外洋銀元，銀元上面鑄「光緒元寶」四字。周圍鑄「廣東省造，庫平七錢三分」十字。並用漢文洋文以便與外洋交易。支放各種餉需官項，與徵收釐捐，鹽課，雜稅，及粤省洋關稅項。向收洋銀者，均與洋銀一同行用等語。於是我國流通之銀元中，始有吾國自鑄之銀元。二十二年湖北繼之。二十三年十月，江南又繼之。二十四年山東繼之。其他各省亦次第推行。三十一年，立總廠於天津。留南北洋，廣東、湖北四局作爲分廠。由總廠發給模樣，成色重量花紋，均須一律。宣統二年，全國各廠皆鑄「大清銀幣」一種銀元。以求統一幣制。旋以國體變更，以需餉之故，將所有鑄成銀幣，陸續隨市價流行於市面。僅成爲通用銀元之一種。民國三年，頒布國幣條例，一元銀幣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總廠開鑄。次年二月，江南造幣廠繼之。發行以來，全國各地頗能通行無阻。民國四年，滬上中交兩行，與錢業公會協

商，將以前所開龍洋行市，一律取消，祇開新幣行市。江南、湖北、廣東、及大清銀幣四種銀元，均按照新幣行市通用。自是我國自鑄之銀元市價，遂成統一矣。二十二年，政府廢兩改元。兩種單位，併成一種單位。棄數千年來固有之單位，採用歐美新單位矣。

最早發明鈔幣者爲我國。唐憲宗時，以錢少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劵而取之。謂之飛錢。宋太祖因之有便錢務焉。此二者，卽今之匯票，尙非眞鈔幣也。宋眞宗時，蜀人患鐵錢太重，交易不便，乃以楮作劵。謂之交子。一交一緡。其後由官設交子務，掌其出入。禁民私造。高宗時創會子，又名曰關子，又名曰關會。性質與交子無異。後以無限止發行，無錢兌現，價値低落。金以銅產缺乏，倣中國楮幣制，造交鈔。有大鈔小鈔兩種。大鈔爲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小鈔分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令百姓永久通流。文字磨滅不現者，可向所屬庫司換易新鈔。元有交鈔，寶鈔。宋金鈔錢並用。而元則廢銅錢而專用楮幣。卒以濫發，使全國恐慌，而元亦亡矣。明太祖初擬專用銅錢。不久苦於銅之供給不足，乃立鈔法。設寶鈔提舉司，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制凡六等。曰一貫、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每鈔一貫，準錢千文或銀一兩。不

久鈔出甚多，價値低落。英宗天順以後，鈔卽廢絕不用。淸初行錢而不行鈔。咸豐後，以軍興需款，籌措無術。議准暫行銀票。嗣後又發錢票。民間行使，甚爲壅滯。光緒中葉，各外國銀行先後設立於通商大埠，發行鈔票。我國市場，始見有銀行券之蹤跡。一般商民感其信用健全，攜取輕便，羣相樂用。市場流行，極爲暢達。當時朝野上下，鑒於發行紙幣之利益，及慨乎利權之外溢，乃亟思挽回之法。光緒二十三年，中國通商銀行照外國銀行辦法，發行鈔票。是爲吾國近代銀行發行兌換券之嚆矢。三十一年，淸政府倣西法發行銀行鈔票。設立戶部銀行，發行戶部銀行鈔票。各省所設之官銀錢局，亦各自發行銀兩銀錢等票，通行市面。自是我國有發行鈔票之銀錢行號，逐漸增加。現今市面流通之銀行兌換券大概可分爲六類：一爲中央銀行發行之兌換券；二爲特種銀行，經政府特許發行之兌換券；三爲普通商業銀行，經財政部核准有案，准許發行之兌換券；四爲地方銀行，經財政部核准發行之兌換券；五爲中外合辦銀行，經政府特許發行之兌換券，此類鈔票近數年來大減；六爲在華外國銀行發行之兌換券。各種券面上，一面爲華文，他面爲英文。以前各代之「通行寶鈔」字樣全去矣。甚至各種鈔票之紙料，亦多來自美國，爲美國印鈔公司所印成。其歐化程

度之深可知矣。

（參觀張家驤中華幣制史賈士毅民國財政史。）

第四節　交通事業

鐵路火車　清季，歐美發明之各種交通事業，逐漸輸入中國。船政之招商局附屬於北洋大臣。內地商船附屬於工部。郵政附屬於總稅務司。路電兩項特派大臣督辦，而未有專部。光緒三十二年，設立郵傳部。路電郵航，始有總匯之區。民國元年，改稱交通部。分路政、電政、郵政、航政、四司。茲就四政之發達分敍如下：

鐵路火車完全爲近代新發明。西曆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英人萊奴特（Reynolds）制凹字形鐵軌，供各公司之用。軌易塡砂礫，性極脆弱，車輛時有越線之虞。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乾隆五十四年）哲索勃（W. Jessop）製凸字形鐵軌，附輪緣於車，爲現今鐵路車輛之藍本。普通道路所用車輛，鐵路上不得通行。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乾隆三十四年）英人瓦德發明蒸汽機。法人喀諾特（Carnot）創一車，以二汽筒置鍋之上，煮水成汽，入汽筒推挽韓轆，迭相

爲用，鼓動車輪，使自行於路上。名曰自行車。一千八百二十一年（道光五年）英人司梯文生(R. Stephenson) 創機關車，試行於司道克登 (Stockton) 至打林登 (Darlington) 路線。載運一般公衆之旅客貨物。是爲蒸汽車之始祖。客貨運輸營業，亦以此爲始。明年，世界有名之利發浦(Liverpool)至曼切斯脫(Manchester)間鐵路開工。公司懸重賞募最精機關車。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九年）行各種機關車，競賽於曼切斯脫。司梯文生所造之樂克德 (Rocket) 車嶄然冠首。每小時能行三十五英里，載重四十噸。人皆稱其便利。爲交通界大發明，縮地利器。較之以往用人力獸力挑負拖載者，不啻一大革命也。司氏發明既出，英國全國震動。競組公司，經營鐵路。以後逐漸改良。每輛裝重可至三千噸。行走速率每小時可達一百英里。歐美其他各國，亦競利用此大發明。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以後，無不動工與築鐵路。鐵路輸入中國，在英國創始後四十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上海英國商人二十七名，上書兩江總督李鴻章，請築上海至蘇州之鐵路。李氏不允。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八月(陽曆)與英人立約築上海至吳淞三十里之鐵路。次年一月二十日鋪軌，四月底竣工，六月開車。營業頗佳。光緒二年

三月三日，該路火車撞斃中國兵一人。蘇淞太道馮竣光即照會英領事，轉令公司立即停止開行。英領不允。南洋大臣沈葆禎亦照會該領停車，仍不允。後由李鴻章與英國公使威妥瑪磋商，以銀二十八萬五千兩購回。三年九月十五日，交與中國官吏後，即命工匠掘起鐵軌，剷平路基，拆毀站房。連同一切材料，不久即運往台灣。因台灣長官擬築一路，貫通該島，故沈督徇其所請也。然終以籌款無方，卒將淞滬全路物品，沈諸打狗湖焉。淞滬路拆毀之年，直督李鴻章允許輪船招商局總辦唐景星修築唐山至胥各莊之運煤鐵路。朝廷禁駛機車。乃聲明以騾馬拖載。工程司英人金達(Kinder) 抱定將來更換重軌之目的，乃定軌間爲英四尺八寸半。光緒五年五月興工，十一月告竣。是爲我國辦鐵路之始。金達氏利用舊廢鍋爐，改造一小機車，力能引百餘噸，名曰「中國之樂克得」(Rocket of China)，七年五月十一日，唐胥路開駛第一次機車。八年，復由英購機車二輛。十二年，唐胥路展修至蘆台。十五年，展至天津，再次展至山海關。此爲中國鐵路之嚆矢。後又展至北京。初擬經通州而地方人民反對。乃改經豐台，至馬家鋪。拳匪亂後，由馬家鋪接修至正陽門。自東便門築支路至通州。光緒二十年，修築山海關外至綏中路。值中日戰起，暫停。二十五年，築

至錦州營口支路亦蕆事。二十六年，進至大虎山。二十九年溝幫子至新民屯完竣。三十年，日俄戰起。日人築新民屯至奉天輕便鐵路。三十一年，由我備價收回。宣統三年，展築至奉天城與南滿相接。於是京奉全路開通。前後共歷二十九年之久，爲國有鐵路之最早者。他如平漢路創議於光緒十五年，開工於二十四年，完成於三十二年。津浦路，創議於光緒六年，開工於光緒三十四年，竣工於宣統三年十月。滬寧路創議於光緒二十二年，興工於二十九年，竣工於三十四年三月。滬杭路創議於光緒二十九年，開工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竣工於民國元年十二月。株萍路創議於光緒二十四年，開工於二十九年，竣工於三十一年十一月。廣九路創議於光緒二十四年，開工於三十三年七月，竣工於宣統三年八月。正太路創議於光緒二十二年，開工於三十年四月，竣工於三十三年九月。道清路創議於光緒二十八年，開工於二十九年，竣工於三十一年。平綏路創議於光緒二十九年，開工於三十一年。平張段竣工於宣統元年。張綏段，竣工於民國十年四月。綏包段，竣工於民國十一年十二月。隴海路創議於光緒二十九年。汴洛段興工於光緒三十年，竣工於三十四年十二月。其開徐、洛觀兩段成於民國四年，徐海段成於民國十三年，觀潼段成於二十一年。此

外尙有大幹路，如粵漢、川漢，勯議已在三十年前，而至今未竣工。此外又有完全外國人所築之路，如膠濟路、滇越路、中東路，完全外國人治理。初與中國人無關係。其後經政治變動，中國備款贖回。而滇越路仍全在法人之手也。民國以來，日事政爭，竟未完成一長路。辛亥革命以後，理想家以爲數年之間可以完成二十萬里鐵路，與歐美並駕齊驅者，至是乃爲一場幻夢也。直至今日，軍事緊急之秋，在要路上，仍未見火車能全代二千年前使用之騾驢車也。交通事業，較之他國，尤爲落伍也。

（參閱曾鯤化中國鐵路史；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輪船　一千八百零二年（嘉慶七年）英國人席明敦（William Symington）造一輪船，以蒸氣力駛之。船名「沙落武鄧達斯」（Charlotte Dundas）。試行於蘇格蘭克萊脫運河（Clyde Canal）大告成功。是爲世界第一蒸汽輪船。地方官以其鼓浪壞堤，禁止行駛。一千八百零七年（嘉慶十二年）美國人福爾敦（Robert Fulton）亦造一汽船，試行於紐約赫德森河。載運行人，亦告成功。由是而各國倣造，爲洋海上航行利器。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

英國輪船哲爾丁(Jardine)自蘇格蘭阿伯丁港(Aberdeen)駛至廣東伶丁洋面。是爲輪船入中國之始。英商意欲用此船爲澳門、廣州、伶丁三地間之送信船。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一月一號，開始駛往廣州。而中國官憲不許通過虎門，竟至放礮轟擊。英人不得已乃將機器拆去，改爲帆船，始得通航。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中國商人合資購「亞丁」(Aden)輪船航行通商各埠。但非通商口岸，亦不得通行。此爲中國人自有輪船之始。閱二年，此合資公司乃改組爲今之招商輪船局(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主動人李鴻章。香港華商資助之。當初目的，爲航行外國船所不通航各港，與洋人爭沿海商務。但政府不允。目的未達。以後政府准許成立。代政府載運三分之一漕米北上。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購買上海聯合汽船公司船隻。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十月二十日，曾遣局中所有「河中」船至檀香山，載運甚多華工。初開始時，營業甚爲發達。但不久而弊竇叢生，毫無發展。數十年間，船隻航線仍舊。最近乃收歸國有。次於招商局者，有政記公司。專營華北奉天各港間之航業。此外有甚多小公司經營沿海長江中航運。勢力遠不如外商。各港埠間，甚至無中國輪船者有之矣。國內

旅行，不乘外國船，則不得達。此種現象，古今中外各國所無，而實亦國恥也。

（參觀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Steam Engines;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電報　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美國人摩爾斯（S. F. B. Morse）發明電報。數年後，改良完備，爲通信利器。各國皆架建電線。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英國人萊奴特（Reynolds）樹立由上海至吳淞黃浦江口之電線。不久即被中國人民拔除。此爲電報第一次輸入中國之情形也。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同治八年），美國盧塞爾（Russell）公司，在上海本地樹立由輪船碼頭至公司辦事處之電報。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大北電報公司，設立香港至上海之海底電線。上海上陸處祕密藏匿，不使中國人見之。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光緒七年，）中國政府允許設立上海至天津之陸地電報。此爲中國第一條電報線。三年後，由天津延長至北京，傳遞軍國大政，消息極爲靈捷。政府中人知其有利，於是各地推廣電報矣。光緒八年，立電報總局管理其事。光緒三十四年，併入郵傳部。現今全國電報局有六百餘所，電線長約四萬餘里。入民國，又增設無線電臺，亦歸電報局管理。

（參觀 The E cyclopaedia Britannica, Telegraph;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s.）

郵政　驛傳爲中國自古所有要政，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也。至元朝而驛政發達完備。明清因之。國家驛站之外，復有民局，專司送信爲人民事業。歐洲郵政發達不過近百年事。最初行用郵票者爲英國。發明者爲羅倫黑爾（Rowland Hill）。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黑爾將所製郵票示之遞信局。一千八百三十七年，英國下議院通過黑爾之條陳，議訂各等郵票價值，先買票黏貼信封而後送信。又議訂防阻僞造法規。一千八百四十年各等郵票通行於英。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瑞士倣行之。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美國行之。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俄國行之。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法國行之。一千八百五十年奧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皆倣行之。自倫敦初次發行郵票，閱二十五年而普遍世界。當時全世界共有一千三百九十一種。其中爲歐洲發行者八百四十一種，美洲者三百三十三種，亞洲者五十九種。非洲者五十五種。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已有八百十一種隨時代而消滅，尚有五百八十種流通世界耳。咸豐季年，商埠增加，各地海關亦隨之而增。同治以後，中國允許外國公使駐在北京。公使及

總稅務司署，欲與上海等地分關僑民通信，借用中國驛遞各關文報往來，皆自行設法互寄。漸啓郵務端倪。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各地海關正式設立郵政事務所，辦理大沽至天津、天津至北京、牛莊、烟台、鎮江各地遞信事務，略倣泰西郵務辦法。交赫德管理。並於是年發行郵票。加入國際郵政同盟。英法各國皆願將上海及香港郵局取消，改歸華關自辦。總理衙門先後飭據江海關道總稅務司籌議，咨行南北洋大臣查核。光緒十六年三月，總理衙門創行總稅務司，以所擬辦法既於民局無損，卽就通商各口推廣辦理。俟辦有規模，再行請旨定設。旋浙海江海各關道，皆稟稱稅關郵局，未經奏定，外人得以藉口。十八年冬，赫德亦以數年創辦艱難，若再不奏請設立官郵務局，恐將另生枝節。是年五月，總理衙門迭接李鴻章、劉坤一咨，據江海關道聶緝槻稟稱，上海英美工部局現擬增設各口信局，異日中國再議推廣，必更維艱等語。二十一年南洋大臣張之洞奏請設立郵局，請飭議。由總理衙門議准，推廣海關郵遞，開設官局並與各國聯會。旋由赫德擬定郵政開辦章程。由是郵務及於各通商口岸矣。二十四年，又由湖廣總督張之洞奏准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及內地水陸各路。迨宣統三年各省通行郵務，共有六百餘局，代辦四千二百餘處。民國

五年，局與代辦處，增至八千七百九十七所，郵件寄出二萬萬五千四十三萬二千二百七十三；包裹寄出二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件；郵差行路達四十二萬一千里；匯寄錢達一千五百九十六萬五千元。並與數國訂立往來互寄之合同。當時郵務經費，皆由海關協濟。宣統三年由總稅務司移交郵傳部，委法國人帛黎為郵政總辦。其職權與總稅務司相等。人員長久留用，及薪水陞階，請假養老等事，均照海關辦理。於是郵政脫離海關，日漸改良，辦理完善，不亞歐美各國矣。舊時驛站，至光緒二十四年完全廢除。民信局則內地各城市中，至前十年尚有存者，近則亦稀罕不可見矣。

(參觀黃序鵷海關通志 Coul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Post Office;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Postage Stamps.)

第五節　教育事業

報館　唐時有開元雜報，記載政府命令，官場消息。可為世界上最早之報章。然此與近代報章意義不同。至於登載普通消息，發表民意之報紙，則僅於鴉片戰爭後，香港割讓，五港通商以後，在外人勢力保護之下，始有真正近代式之報章也。在中國最早之英文報為廣東週刊（The

Canton Register）。每星期出一冊。始於一千八百二十七年（道光七年）十一月八日。直至香港割讓於英國後，該報移至香港，更名香港週刊（The Hongkong Register）。至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九年）始停刊。次有香港日報（Hongkong Daily Press）及每日報（Daily Mail）兩報皆在香港發行。時期俱在道光末年。時伍廷芳嘗命人將香港日報譯成漢文，流行粵地。純粹漢文報章，當推上海字林洋行之上海新報，及粵人在申所設之匯報、彙報、益報等。但不久即閉歇。繼有申報。至今屹然存立。館主初爲英人美查（Major）。秉筆者爲中國文人。美查爲上海美查洋行主人。報始於同治壬申三月（西一八七二年）。除禮拜按日出報，每紙十文，京報新聞及各種告白，一一備載。在各口岸，風行甚廣。稍後至一千八百八十年（光緒六年）上海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發行滬報，不久停刊。再閱十二年，則有新聞報。創辦者爲張叔和。後爲美國人福開森購買。申報、新聞報、至今屹然存立。今代全國之中，大小日報，約二千餘種。不獨通商口岸有之，即內地偏僻小邑亦有之。大者日銷行數萬份，小者僅數百份。二千餘種之中，重要者僅約三四百份。其餘則皆範圍不出百里也。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五年），時全國日報約僅

有十二種。但此後十年間，正如雨後春筍怒生，新開之報館甚多，而多不永命。數月或數年卽消滅。拳匪亂後，發達尤速。各種科學雜誌，婦女雜誌，圖書雜誌，皆流行甚廣。販報爲一種新事業矣。辛亥革命成功，報紙鼓吹，尤爲有力。報章宣布官吏受賄陰私，造成輿論，指導社會。此其功也。但亦有供個人與黨派野心家之宣傳詭詐者。革命以後，報紙幾全爲機關報。其無黨派而保存者，僅上海之申報新聞報而已。至若月刊雜誌之最早者爲萬國公報(Review of the Times)。創辦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創辦人爲美國教士林樂知。次爲中西教會報，創辦於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光緒十七年）創辦人爲樊漢(J. W. Garnham)。次則教會新報創於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光緒二十年）。三種雜誌皆爲宣傳宗教而設。但宗教之外，對於政治社會時事亦皆記載。頗爲中國士大夫所歡迎。流行甚廣。傳播各種知識，厥功甚偉。週刊之最早者，爲興華報(Advocate)，發行於福州。創辦人爲美國美以美會派克博士(Dr. A. P. Parker)。流行於中國各地，及海峽殖民地甚廣。雖爲教會所發行，而新聞不限於宗教。關於科學有用知識，亦廣爲登載。爲當時有用之週刊也。通聞報創始於一千九百零二年（光緒二十八年）。爲英美長老會所設。性

實與興華報相同。銷行亦甚廣。第一年在全國中銷行七千餘份。以上皆教會人在中國所辦之初期日刊，週刊，月刊物也。中國人自己所辦之旬刊最早者，爲光緒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年）之時務報，後改昌言報。主筆人初爲梁啓超，後爲汪康年。此報爲是時維新黨人最要之機關報，而實亦最初談政治改革之雜誌也。昌言報不久隨戊戌政變而消滅。梁氏亡命日本後，舉辦清議報，仍鼓吹政治改革。不久又改辦新民叢報，灌輸各種學識。每期銷行十餘萬份。人人爭讀，影響中國社會輿論之鉅，直至於今，無他雜誌，可與匹敵也。梁氏文學優勝，爲一原因。而當時適値拳匪亂後，舊文化，舊制度，不滿人望。士大夫求新知識之慾甚熾。梁氏亡命日本，得彼邦之普通常識。以暢達流利之文，盡量灌輸於國中。所謂因時乘勢者也。待以後梁氏又主辦國風報、庸言報。流行遠不如新民叢報矣。蓋國民知識程度已高，膚淺議論，無裨益於專門科學矣。然梁氏一時之功，固不可泯也。此外商務印書館所出之東方雜誌亦爲灌輸常識之良品。已有三十年之歷史。地學雜誌爲中國地學會出版。創辦人張相文。起始於淸季宣統二年，迄今已二十四年之久，爲國中最早而悠久之專門科學雜誌。科學社出版之科學雜誌起始於一九一六年至今亦有十七年之歷史，灌輸各種

天然科學知識，或發表各人研究。以上三種雜誌，壽命最長。辛亥革命以後，日刊、週刊、月刊、季刊、年刊之各種雜誌，出版益多，但較之歐美日本，尚望塵莫及。且多半爲政黨之機關報。無五年以上之壽命。甚至持論偏激，不合於中國之社會情況，徒紛亂靑年之思想，使彷徨無措，淪入左道，國家政治離軌愈遠者有之矣。此類雜誌，有之反不若無之爲愈也。

(參觀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學校　科舉時代，我國教育制度至爲簡單。教育機關僅私塾與書院。私塾程度高低，無人過問。書院爲政府所立。備學人讀書考績，每月助寒士若干養生費。學子所學者，僅文學一門而已。中國與西洋接觸，自明武宗正德以來，已四百餘年。西洋文化教育高於中國，直至最近，中國人始知之。明代四譯館，清乾隆時之俄羅斯文館，皆僅教育通譯人才，並非欲學得外國之長也。近代最早之學堂，爲同治元年（西一八六二年）所設之北京同文館。初亦僅備造成翻譯人才。以後逐漸增設他科。同文館聘美國人丁韙良長其事。光緒二十四年改爲京師大學堂。分科教授。以孫家鼐爲管學大臣，余誠格爲總辦，仍以丁韙良爲總教習。實權皆在丁韙良。科學課程，管學不能問。時本

國人留學外國大學，歸國者極少。故求西學者恆於教士。戊戌政變，新政悉罷。惟大學以萌芽早得不廢。拳匪亂後，以張百熙為管學大臣，謝去丁韙良，以吳汝綸為總教習辦七科大學。汝綸至日本調查學務。値學潮，被讒罷歸，旋卒於鄉。張鶴齡以副總教習主教務。不久張百熙亦被擠而謝絕學務。張之洞入樞府兼管學務。繼續七科大學計劃。與張鶴齡論學科不合。鶴齡辭去以後主其事者為張亨嘉、李家駒、朱益藩、劉廷琛、勞乃宣、柯劭忞、嚴復。入民國改為北京大學校。長其事者初為馬相伯、何鞠時、胡仁源。皆無甚影響於國家政治。民國六年後，蔡元培長北京大學，乃與政治發生密切關係。而學校紀律亦隨時勢日益廢弛。故毀譽不一。但其影響於革命及文化運動之鉅，則人人承認之也。北京大學以外，最早之學堂為張之洞於光緒十九年在湖北武昌所辦之自強學堂。分方言，算學，格致，商務四齋。畢業數班。不久停辦。亦頗為當時言時務者所重視。光緒二十一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設天津中西學堂。主謀者為盛宣懷。中西學堂即今之北洋大學堂，又曰北洋工學院也。當時分為頭等，二等。頭等學專門學。分工程學，電學，礦務學，機器學，律例學五門。是中國學校有專門學之始。二等學校，僅為預備學校。學西文四年，挑入頭等學校。頭等學堂總理為伍廷芳。二

等爲蔡紹基。總教習爲美國人丁家立。丁時充天津美國副領事也。光緒二十三年，盛宣懷又奏設上海南洋公學，以美國人福開森爲總教習。校中分師範院、外院、中院、上院。師範院卽師範學堂也。此爲中國有師範學堂之始。外院卽日本師範學校附屬之小學院也。中院卽北洋之二等學堂，上院卽頭等學堂也。各院皆四年畢業。南洋公學卽今上海交通大學。北洋南洋兩校培植各種人才甚多，有功於輸入歐化尤偉也。光緒二十八年，拳匪亂後，英人李提摩太提議在賠款中提出銀五十萬兩，創辦山西大學，以啓民盲，俾以後不致再釀拳匪仇教之禍。主持其事者初皆爲英人。以後交還中國人自辦。山西地方偏僻，其大學僅於本省有相當影響。而在全國，則視上方數校有遜色矣。以上皆在學制系統未建立前之學堂也。此外又有海陸軍專門學校。與中國近代之歐化輸入亦不無有相當影響。最早之軍事學校爲天津武備學堂。創於光緒十二年。主其事者爲李鴻章。教員皆爲聘自德國之兵官。拳匪亂時，此校被燬。和議成後，遷於保定。以後改爲軍官學校。中國軍隊之歐化，此校影響甚大。

（參觀舒新城中國教育史料。）

第三章　無形之歐化卽歐洲思想文明之輸入

第一節　宗教思想

尚書舜典記舜受堯禪後，『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類、禋、望、皆祭名也。六宗者，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諸神也。舜典所記，可以見上古時代中國之宗教爲多神教。各神之中，上帝最高。上帝爲昊天之神。故古書上『天』字有時與『上帝』同義。中國古書上所記『天』與『上帝』之能力，多與今代基督教所言上帝(God)相同。基督教聖經創世記言上帝於七日之內，創造天地人物。而中國詩經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書經仲虺之誥云：『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是中西相同者一也。基督教言上帝能降福賞善，降災懲惡。而中國書經皐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又伊訓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中西相同者二也。基督教徒信人之福澤，以至衣服飲食，

皆由上帝賜予。論語卷十云：「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是中西相同者三也。中西所信上帝之能力，固多相同，但亦有不同之點。基督教爲一神教，上帝之外，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此其不同之點一也。中國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要皆當人之生時而然，而基督教則有天堂地獄之說，爲處置人死後賞罰問題。孔子大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表彰之道德，皆爲個人在人羣社會中所應當然之事。至若死後如何，則孔子對季路之問，已言未知生，焉知死矣。死後靈魂之昇天堂或下地獄，與夫因報拔濟諸說，孔子以及其他春秋戰國諸子，竟無一人言及者。漢武帝罷黜百家，儒家思想統一全國。人所信者一種爲人之道，孝弟忠信而已。東漢以後，佛教傳入中國。天堂地獄，因果報應諸說，大爲昌明。而展轉輪迴，尤娓娓動聽。補秦以前中國聖人所未言之闕。予人以心理上一大安慰。加以自漢末至唐中葉，佛教書籍，譯成漢文者，幾於汗牛充棟。其內容如何，姑不必論。其量之多，已足驚人。文人學士，於年老倦政以後，輒喜披覽，以度殘年。印度哲理，自有其圓密之處，可以使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紬繹不盡。是以佛教入中國，至唐時已根深蒂固，雖數經摧殘，而始終無損於其流行。基督教唐太宗時入中國。唐武宗時

禁絕。元時再入中國。元亡亦隨之而消滅。明萬曆中，三次入中國。流傳至今。計其信徒，天主教約有三百五十萬人，耶穌教約有四十萬人，合計約四百萬人。由萬曆九年（西一五八一年）利瑪竇初入中國，迄今已三百五十餘年之久。所得信徒人數，乃如是之少，而在社會上之勢力亦不巨。不可不謂之失敗矣。其失敗之理由，可約略分述如下：（一）基督教教規太嚴謹，不肯與中國禮俗調和。以致教徒與國人隔膜，如異國人焉。例如帝制時代不跪拜皇帝，不拜祖宗牌位，不拜孔子。以致有清一代，無一教徒能充達官，能在政界佔勢力者。中國羣衆，皆唯士大夫階級之馬首是瞻。教徒地位不高。如何使普通人民對之有信仰。此爲其教之不能大行，大原因之一也。（二）鴉片戰爭以後，教士利用外國政治勢力，壓迫中國，欺陵中國人，袒護教徒，不守中國法律。以致民衆對之感情甚惡。釀成拳匪仇外之舉。拳亂以後，中國受重創，教中人亦改變政策。然普通人視教徒，猶多懷舊觀念，視之幾如異類也。（三）基督教入中國最後，中國爲開化之邦。人倫道德之教則有孔子；死後因果與靈魂處置，又有佛教。池中容量已滿，先入爲主。他教欲從新羼入，自不容易。（四）基督教無論迴再生之說，予人之希望較佛家爲小。（五）今代中國基督教徒無古代佛教徒之

熱誠。對於基督教中之哲理書籍，甚少翻譯。僅一部聖經，不足引足中國人之敬信。（六）宗教信仰心在西洋亦已衰落。來中國之西洋人多有攻擊宗教者。謂社會改良，國家富強，專在教育而不在宗教。尤以最近由俄國輸來各種新思想，足以完全傾覆各種宗教也。

第二節　倫理思想

我國古代倫理道德觀念，皆淵源於孔子。三綱五常之說，革命家舉爲詬病。而細審之無足病也。人生在世，不能離羣而孤立也。既有羣則小者爲家，大者爲國。家與國之團體中，必有一種結合力，以維繫此團體，使之不渙散，不瓦解。此結合力爲何？卽一種自然發生，所應當然而起之道德觀念也。此道德觀念，綜合言之，卽『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今代革命家舉此以爲詬病者，無非因三綱五常之中有『君臣』二字與共和政體不合，與自由平等主義矛盾。殊不知『君臣』二字不過在古代人羣社會中代表『上下』而已。人類文明，不論如何發達，而發號施令之機關，不能闕也。不能人人發號施令也。在下者對於發號施令者，不能不負服從之義務也。發號施令者之地位，在古代以力取之。近代民權

發達之文明諸國，則由人民選舉出之。由選舉出者，不論其稱號爲總統，爲首相，爲委員長，而人民未有不服從者也。故君臣二字雖不必有，而服從之義務，不論何種政體之下，不能闕也。至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則不論何種宗教，何種政體，何種主義，吾未見其有可廢之理由也。今之革命家喜新厭舊，打倒一切舊物。舉所有中國舊倫理而推翻之，而又無新倫理而代之。使全國靑年徬徨歧途。全社會成父子無親，上下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之狀態。人羣國家，渙如散沙。使全國鼎沸，生民塗炭。腹地各省，赤地千里。此僅全人口中百分之二三知識份子所造成之恐慌也。若造亂份子更增加至數十倍，則其亂之情況，更爲擴大可以想見。以前人懼亡國滅種者，今則未有外國來滅中國，而自己已將中國滅亡。未有外人來滅吾種，而吾人已自相殘滅矣。危險思想之輸入中國，不宜早禁絕乎？

第三節　政治思想

吾國古代政體之組成，亦完全依儒家學說而成。『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國者家之放大者也。君爲一國之長，猶父母

爲一家之長也。故又稱國君爲人民父母，而人民爲國之「赤子」也。齊景公問政。孔子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其道甚不易。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言國君不可妄自尊大，漠視民意也。君臣之間，感情相對而生。洪範九疇，教爲君之道也。國君無道，則人民可以革命。革命者革天命也。君主皆受天命而爲天子也。一代受命，必有河圖洛書。爲天命之據。漢高祖以平民革命成功。不得不假託斬白蛇，神母夜號，劉媼夜出，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以後歷代受命，皆有靈瑞符應。班彪王命論，可以代表此說。蓋聖人懼人人不安本分，欲爲天子而革命也。乃不得不以神道設教，以杜慝妄，而免不絕之戰爭也。中國自有史以來，國家卽依此組織。唐虞禪讓，爲終身帝制。繼位人由前帝薦之於「天」。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攝政多年以後，堯老乃禪位焉。舜亦如之。至禹而傳子不傳賢。家天下之局以定。四千年來如一日。未嘗有何變更也。四鄰諸國政體若何，亦無影響於中國也。契丹初起，八部酋長，皆由選舉而來。三年更代。耶律阿保機立，誘殺八部酋長，自立爲帝不受代。蒙古未入中國先，有庫里爾泰大會。國君死，推選

新君。候補新君，亦皆前皇之子也。至忽必烈則不待大會選舉而自立爲帝。庫里爾泰大會，由是而廢。據中國史書所載，國君由選舉者，僅此二例而已。契丹蒙古，初皆爲遊牧民族。文化稍進，即廢除選舉制也。清末國勢衰微，外患日烈。憂時之士，求本國致弱之原，初以爲僅槍礮兵器不如外人。甲午中日戰後，更進一步，求其原因，以爲政治不良，上下隔膜之故。康有爲等公車上書，求變法維新。效法外國開議院，萬機決於公論。於是有戊戌百日之變法。不久新政盡爲守舊黨所推翻。西太后復垂簾訓政。康梁皆亡命海外。至光緒二十六年釀成拳匪之亂。創痛鉅深，清廷始又稍稍恢復新政，廢科舉，立學校，籌備立憲，而又踟躕懷疑。同時民間，亦皆知舊文化不足救亡。求新知識之慾望甚切。留學西洋者接踵途間。而日本距中國僅一衣帶水。學費甚廉，文字又近。各省往日留學者，數達萬人以上。各種新思想新學說，猶如怒潮，輸入中國。輸入新思想新學說，最有功者，首推梁啓超。梁在日發刊新民叢報、新小說、國風報等。以平易暢達，條理明晰之文，灌輸各種新學說新思想，尤具特別魔力焉。次爲嚴復。嚴爲早期西洋留學生。國學淵深，溝通中西學術，譯西洋哲學書甚多。梁氏新民叢報中關於西洋政治思想之輸入者：（一）爲盧梭（Rousseau）民約論。（二）爲孟

德斯鳩三權鼎立說。前者爲鼓吹革命，後者爲建綱立國。兩說於一百六十年前，在歐洲皆有極大勢力。盧梭謂人類聚合，最古而最自然者，莫如家族。一夫一妻之相配，實由契於情好，互相承認而成。是卽契論之類也。既曰契約，則彼此之間，各有自由之義存矣。不獨此也，卽父母之於子亦然。子之幼也不能自存。父母不得已而撫育之，固也。及其長也，獨相結而爲尊卑之交。是實由自由之眞性使之然，而非有所不得已者也。世人往往稱家族爲邦國之濫觴。夫以家族之親，其賴以久相結而不解，尙必藉此契約，而況於邦國乎。衆家族既各各因契約而立矣。寖假而衆家族共相約爲一團體，而部落生焉。寖假衆部落又共相約爲一團體，而邦國成焉。所謂相約者，不過彼此心中默許，不知不識而行之，非明相告語，著之竹帛云爾。人人既相約爲羣以建設政府，其最上之主權，當何屬乎？盧梭以爲民約未立以前，人人皆自有主權。而此權與自由權全爲一體。及約之既成，則主權不在於一人之手，而在此衆人之意。卽所謂公意者是也。中國儒家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亦卽國家主權在於民衆公意之謂也。爲國君者當採集民意所好所惡，以定施政方針也。儒家將天位之最高，國君代天行政，故謂之『天子。』後代天子皆敬天法祖。古代中國人頭腦簡單，

特立一高高無形，不可卽之「天」以神祕之。而天之視聽，卽民之視聽也。盧梭以爲凡邦國皆藉衆人之自由權而建設者也。故其權當屬之衆人。而不能屬之一人或數人。實而言之，則主權者邦國之所立。邦國者衆人之所有。主權之形，所發於外者，則衆人共同制定之法律是也。盧梭又曰：一邦之民，若相約擁立君主，而始終順其所欲，則此約卽所以喪失其爲國民之資格而不復能爲國也。蓋苟有君主，則主權立卽消亡。盧氏據此眞理，以攻擊世襲君主之制，及一切貴族特權之政治。盧梭又以爲主權者惟國民獨掌之。若政府則不過承國民之命，以行其意欲之委員耳。國家成立之原因，盧梭闡明盡矣。其說在歐美，影響甚大。美國獨立，法國革命，皆受其賜。梁氏僅爲提要之敍述。當年曾有某君，自日文譯成漢文，訂爲兩册。似亦不全。入民國後，馬君武直接自法文將全書譯出。國人始見此名著全豹。拳匪亂後，雖無全部譯文，而其影響於中國青年革命思想甚鉅。盧梭學說將中國四千年來家天下之觀念，完全打破。盲目之淸廷，不知順應潮流，早日立憲，以安民心，而存滿漢偏見，激成辛亥革命。今者全國百分之九十人民，不識不知，毫無共和之程度。百分之十知識份子中，又多自私自利，祇知昇官發財，無毫忽爲國爲民觀念。下至綠林暴客，販夫走卒，不知共

和國民之義務，徒知擁戴民主政治之口頭禪，蠢蠢然爭爲總統、元帥、方鎮、軍長矣。人倫、道德、服從義務，組織人羣社會根本要義，蕩然無存矣。民國成立至今二十二年，無一微之建設，武夫文士，或爲物質之摧毀，或爲精神之破壞。外則蒙古、西藏，東北四省，脫離中國，不許中國人往矣。內則貪官汚吏，驕兵盜匪，遍於全國。民不聊生。辛亥以前，熱心革命之書生，至此亦無如何，仰天咄嗟而已。

第二種西洋政治思想梁氏輸入者，爲孟德斯鳩三權鼎立說。三權者立法、行法、司法是也。孟氏謂立法、行法二權，若歸於一人或一部，則國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權。何則，兩權相合，則或藉立法之權以設苛法。又藉其行法之權而施此苛法。其弊何可勝言。司法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法權，同歸於一人或一部，則亦有害於國家之自由權。蓋司法權與立法權合，則國人之性命及自由權必致危殆。蓋司法官吏，得自定法律故也。司法權與行法權合，則司法官吏將藉其行法之權，以恣苛虐故也。若司法、立法、行法、三種合而爲一，則其害更大，自不待言。孟氏名論，西洋各國皆採行之。中華民國成立亦倣行此制。孟氏學說載於所著之萬法精理。梁氏亦僅爲提要之敍述。張相文自日文何禮之本有全譯。頗有爲潤文人誤改之處。嚴復自英文本譯出，名曰法意。自法文直譯之本至

今尚無。以上皆民主政治（Democracy）學說也。

最近俄國革命以後，有兩種新主義產生於歐洲。一為共產主義，創於德國人馬克思，而試行於俄羅斯。與俄國人性情社會，多不相合。致饑饉屢起，餓死人民數百萬。其首領見道窮不通，已大變前計。現所行者，實國家社會主義也。二為因共產而起之法西斯主義。創於現在當權之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倣行於土耳其、德意志，皆有相當成績。此兩種新主義，現亦皆輸入中國。共產主義之書出版甚多，惜亦皆如以前梁啓超之輸入民主政治。斷章不全。法西斯主義之書尤少，茲特再略述如下：

近百年來，歐美各國工商大興。資本主義極為發達。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於是而有限止資本家之各種政策。英美法德諸國有遺產稅，所得稅等。其本愈多而稅益大。亦即限制富者愈富之意。擴抽稅終有止境，不足以限止大資本家之產生也。於是而有馬克思共產主義之發生。主張各種工商業、房屋、土地、礦山、鐵路、六畜等，皆歸國有。由政府經營。人民作工為一種義務。人人必須作工。無工資。人民飲食衣住所費，皆由政府發給。不許人民有私產。如是則一國之中，無富人亦無貧人。

人人皆有工作，有衣食。斯誠理想之大同世界也。欲行此主義，必須將現有私產，悉行沒收。私產制度，行之已數千年。人人皆不免有自私自利之心。農人終年勤勞所收穫者，皆被政府派人徵收以去。於是不甘心工作，或埋藏所穫於地下。工作效能，大爲減少。饑饉屢起。職是故也。沒收現有私產，又豈人人所樂。俄國試行此制，經莫大犧牲，扞格不行。不得不改回至舊制。許人民私有土地，私有儲蓄。但加以限制而已。民國九年，俄國派加拉罕爲駐北京公使，廣事宣傳。中國知識階級好空談，不務實際。聞其說而好之。天下貧者多而富者少。金錢尤爲人人所好。俄人以金錢搜買學生。北京各學校幾爲宣傳共產之中心。孫總理欲革命之速成，倡國民黨共產黨合作。在廣州成立之國民政府，容納共產黨人。民國十五年，武漢政府成立，共產黨大熾。及南京政府成立，國共分立。而共產黨羣趨江西另組政府。蔓延各省。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無不受其蹂躪。赤地千里，國力大損。被兵各省，人口皆銳減。可見其禍甚慘。俄國人行共產，及其他歐洲各國之有共產黨，皆爲擁護主義。而中國之共產黨，除極少數，萬分之一，書生迷信學說者外，餘皆爲未得昇官發財機會，因而反對政府者，及因饑寒壓迫，流離失所之貧民，烏知所謂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上確爲佳美，爲

世界進化之極軌，爲儒家大同主義。但吾所欲問者，中國進化至何地步，能否行共產主義也。吾茲特引今年三月八日，英國下議院兩黨員之辨論。藉伸吾說。社會黨員馬格斯敦(James Maxton)爲左派激烈份子。發言曰：『鄙人近來考察結果，解決人民中樞問題之先，信仰舊社會秩序之心理，必須掃除，而以他種主義代之。從根本上重新建造。方可使社會安寧，民衆懽樂。吾人今實生於革命時代。舊存之經濟與社會秩序，日趨崩潰。其證明可於各種日報見之。世界各處商業上罪惡與衰弱，記不勝記。舊時制度及道德之法律，用以維持以前各種秩序者，亦信譽日趨崩潰矣。』馬氏說畢，自由黨員霍勃京生(Hopkinson)起而駁之曰：『鄙人深信以改變制度爲求達進步之方法，實爲緣木求魚之舉。人類全部歷史，確實指示吾人，若男女個人不先改革，則絕無進步可言。欲求進步，必須社會中大多數人肯爲國家工作，獻其勞役與其生命於羣衆。而不爲私人謀福利。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男女，尚無此精神。故資本主義制度得以生存。此種制度，乃代表一種情況，在大多數男女皆自私自利，無公共心之社會中，必然發生之結果也。當今之世，男女不先自革心洗面，而欲驟然實現理想社會制度，其眞爲大愚大錯矣。』馬氏與霍氏皆英國人也。各就所見而言。

馬氏之黨，在國會中占少數。霍氏所言，博多數人同情。英國爲世界上一等強國，文明程度最高，言論最自由之國家。政府所採政策，取決於多數人民投票。多數人民欲保守，卽保守；欲共產，卽共產。絕無壓迫不自由之事。尙有霍氏一針見血之言。大多數英國人愼重行事。現今並未採行共產政策。吾欲問中國之知識份子，中國人程度較之英國人何如？自私自利之心與潔己奉公之念，較之英國何如？無英國人之程度，與潔己奉公之心，而欲行英國人所不敢行之政，吾實未見其可也。中國四千年家天下之歷史，卽足證明中國人爲世界上最自私自利之民族也。共和政治，總統首相，由人民投票選舉，四年或七年一任，下野後與平民儕伍，中國自有史以來所未見也。聖帝賢王，功德利民，足以垂範後世者，史不絕書。而實不過使人民濡恩懷惠，不叛亂，不反上，鞏固其家，作子孫萬世之業耳。所謂私之至則爲公也。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可以代表中國人也。既充終身總統，而又復欲爲皇帝。一生所作所爲，一舉一動，皆爲自私自利，以遂其家天下之慾。彼爲一國元首，舉動俱爲天下人所注意，所知悉。至若其下之督軍、鎭守使、師長、旅長、團長、營長、連長、排長、以至士兵；文官則自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司長、科長、科員、以至錄事；外官則自省長、道尹、縣長、下至學

校學生，實亦無一不抱昇官發財，顯親揚名，光榮里第之自私自利之觀念，以世界上最自私自利之民族，而欲行人類進化極軌，大同世界至公無私之共產主義，焉得不釀成猛獸食人之大亂也。

因共產主義猖獗而發生之法西斯主義，創始於義大利人墨索里尼。墨氏至今尙爲義國首相。其說近亦傳入中國。法西斯，義語棒也。法西斯主義者，國家主義也。墨氏於十年前，創此主義時，義大利國亦幾淪於共產黨手中。墨氏倡法西斯主義以抵抗國際之共產主義。保守現今資本制度。行一黨專制政策。法西斯與共產兩主義，皆爲狄克太透制（Dictatorship），犧牲民主政治（Democracy）也。義國自墨氏執政以後，秩序恢復，進步甚速，建設甚多。當初反對黨人對之頗多誤解。十年以來，國人見其行政，大公無私，亦皆諒其苦衷。他國苦於政黨意見紛歧，及爲工商凋敗，經濟恐慌，造成數千百萬人失業，共產黨人日增者，亦漸倣之。如德國之希特勒黨人，最近亦步墨氏政策而實行狄克太透制矣。近十年內，他國在各種政體之下，倣行狄克太透制者，有波蘭、猶哥斯拉夫國、捷克國、匈牙利、西班牙、土耳其、日本、德國。即民主政治發源地之英美二國，亦感於在民主政治下，應付現今千變萬化之時局爲艱，漸趨於狄克太透制矣。英國現在執政之麥克唐納內

閣，合國中保守，自由工人三黨領袖組成。放棄數百年來之政黨內閣。俾得舉國一致之擁戴，可以臨機應變，以對付內外難題。美國新總統羅斯福就職於銀行大恐慌之際，亦要求國會，付以臨時獨裁之權，不必先咨詢國會。全世界狂瀾滔滔，所到之處，民主政治皆被席捲而去，代以有威權有勢力之獨裁政府，指揮民衆矣。卽共產政治之俄國，在斯丹林獨裁政府指揮下，成績斐然可觀。第一五年計劃成功，又進行第二五年計劃矣。政治循環，由共和變數人專制；由數人專制，變一人專制；由一人獨裁復變共和。歐洲古史，昭然若揭。近代歐洲人行民主政治已百餘年。今潮流所趨，其將復返專制乎？中國歷史既如此，而人民程度又如彼。民主代議政治既失敗，共產主義又釀亂，其與中國國情稍近者，其爲意大利之法西斯主義下之狄克太透制乎？唯推行法西斯主義，須有墨索里尼、希特勒之魄力，與爲公無私之心。否則徒爲袁世凱第二而已。一言以蔽之，各種政治，各種主義，各種思想，皆不過爲解決民生問題。各國政治家視其國情而採取相當辦法。取其辦法而加以名辭。欲達目的，皆以潔己奉公爲最要。斷無專爲自私自利，昇官發財，卽能成事也。中國人近數十年，專剿襲外國文章，各種政體，主義，思想，無不輸入而行之，無一成功。淮橘成枳，當知所省。革命

當先從革心入手也。大學所謂「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也。

(參觀梁啓超飲冰室全集；夏文運意大利法西斯運動；佩萱魏谷合譯墨索里尼自傳；Ivy Lee, Information, No. 113,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第四節　學術上各種思想

進化論　進化論創始於英國人達爾文(C. R. Darwin)及瓦拉斯(Wallace)。達爾文所說，尤爲精邃。達爾文以爲生物變遷之原因，皆由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來。而勝敗之機，有由於自然者，有由於人爲者，由於自然者，謂之自然淘汰。由於人爲者，謂之人事淘汰。淘汰不已，而種乃日進矣。適者生存之理，不獨驗之於禽獸草木爲然，卽人類亦然也。古希臘之斯巴達人對於子女之初生也，驗其軀格。若有尫弱殘廢者，卽棄之殺之。無俾傳種。惟留壯健者，使長子孫。以故斯巴達人以強武名於時。自達爾文選種之說昌明，各國教育事業，大有進步。當今文明世界，雖不用斯巴達人野蠻手段，然知人之精神與體魄，皆能因所習而有非常之變化，故各國學校益注意

於德育體育之兩途。所謂適者生存，非僅爲其本體之生存而已。必以己之所以優所以勝之智者力，傳之於其子。子又傳之於其孫。久而久之，其所特有之奇材異能，益爲他物所不能及。於是其當初偶然所得之能力，遂變而爲一定之材性。馴致別爲一種族而後已。此種之變遷所由起也。今世界萬物散列於目前者，其先必皆有所承襲而來，最始同本於一元。現今生物界，不過循過去數十萬年自然淘汰之大例。由單純以趨於繁賾而已。人類亦爲生物之一種。不能逃此公例。最初亦從下等動物，漸次進化而來。達爾文將其畢身研究所得者，著之於其所著之種源論。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九年）。關於人類之研究，著之於人祖論。出版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達氏進化之說出，無論政治、學術、哲學、宗教、社會各種思想，皆受其影響。幾於另產一新天地也。最先輸入達氏進化說於中國者爲嚴復。嚴氏於光緒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譯出英人赫胥黎之天演論，即東人所稱之進化論也。嚴氏譯出書籍頗多。此書爲其最初譯作。亦最有影響於中國思想界。嚴氏他作，皆無此書流行之廣也。赫胥黎之天演論僅進化論之小緒言而已。達爾文之名，亦由嚴氏介紹於中國士人。梁啓超新民叢報有短記。題曰：『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

及其略傳。』達氏種源論原書，入民國後，馬君武始有全譯。過耀根近代思潮中亦有短篇序述。達氏之人祖論則至今無譯本也。

西洋哲學　西洋哲學範圍大矣。哲學家多矣。每一種哲學，或每一家哲學，各爲數行之敍述，即可成爲巨册。非吾此篇範圍所宜言。讀者自有西洋哲學史可供翻閱。吾今僅總述西洋哲學之輸入中國之經過耳。查最先輸入西洋哲學於中國者爲明末天主教教士傅汎濟（F. Furtado），傅氏與李之藻共譯希臘哲學家亞利斯多特勒之寰有詮六卷、名理探十卷二書雖久譯出，而迄未刊印。名理探至民國十五年，北京輔仁大學始爲出版。寰有詮則尚未見世。由明末迄清末二百五十餘年，西洋物質文明之科學，久已陸續不絕輸入中國。而西洋思想文明之哲學，則遲至拳匪亂事前後，始由嚴復重啓障幕而輸入焉。嚴復譯有穆勒名學、羣己權界論，斯賓塞爾羣學誼言，雖皆爲名著，但皆緖言之類，而非大部原書籍也。大部原書籍，至今尚無一部譯出。所輸入者，皆斷章不全之學說也。哲學玄妙，哲學書文辭亦多深奧難明，非淺陋所可解。其於社會影響實甚大，但無切實用途，近於清談。即在歐美哲學家亦漸少，而羣趨於科學。古代希臘人所稱哲學範圍，多被科

學使然。古代哲學範圍內之科學，在近百年內，前後脫離哲學而獨立矣。中國人學哲學者甚少，與哲學書籍之甚少譯成漢文，由是故也。玆就片斷翻譯，中國人所知西洋哲學，記之如下：英國倍根之實驗派，亦名格物派之學說，及法國笛卡兒之懷疑派，亦名窮理派說，德國哲學家康德之學說，古代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英國人顛德，邊沁、斯賓塞爾、伯倫知理、斯密亞當等學說，梁啓超新民叢報皆有敍述。斯密亞當之原富，嚴復有全譯。唯嚴氏好用古文怪字，使一般人不能讀。書雖譯出，而影響於中國人之經濟思想甚微也。入民國後。東西洋留學回國者頗多，對於西洋哲學如尼采之超人哲學，托爾斯泰之人道主義，詹姆斯之實用主義，歐根之理想主義，柏格森之直觀哲學，皆由片斷之譯文輸入。各大學亦多有哲學系。各教授雖無著譯之輸入，而爲口授之輸入，其功亦不淺。近來傳西洋哲學有聲譽者爲張嘉森與張東蓀二人。此外又有原學西洋哲學，歸而用西洋條理整理中國舊哲學有聲譽者，爲胡適與馮友蘭二人。

（參觀梁啓超飮冰室全集；清代學術概論；過耀根近代思想。）

第五節　藝術思想

文學改革　中國舊文學艱難，不足以代表現代社會思想，應新時代之需用。謀求易以淺近文體者，前已有人。而迄無適當新文學以代舊文學。清末，梁啓超用一種平易暢達，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之文，編纂各種雜誌，號「新文體」。一時海上雜誌日報競效之，風靡一時。清末國人思想，多受此種文體之影響。梁氏自謂其新文體縱筆所至不檢束，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梁氏文體較之以前舊文學已淺易多矣。民國七八年時，陳獨秀主持新青年雜誌，倡用白話文，胡適和之。一時教育界中人多贊成之。復以政府之力，在中小學校推行之。現在白話文已征服全國矣。白話文較之梁氏文更爲易學。誠爲普及教育之利器。文與言合一，與歐洲各國相同矣。唯白話文與舊時文言距離太遠。小學六年全讀白話文。中學初三年，國文課程時間，十分之七又用之白話文。後三年，仍有十分之三時間用之白話文。入大學後，分科治專門學。無暇再治國文。各科學生理應可以如意參閱中國書籍，運用中國文學以達其意矣。然近年以來，入大學學生不能讀文言書，句讀不辨者，日益增加。對於舊文學，幾等文盲。甚至大學已畢業，而文言不通者多矣。參閱中國舊書，因覺困難，而俱棄之不讀矣。此種情形

甚爲危險。本國人不能讀本國書，將失去自己民族特性，忘其祖宗歷史。此與法國人滅安南、日本人滅朝鮮何異。教育家急宜設法矯正，學生在中學期用於文言時間，宜多於白話文也。民國八年，北京大學文科又刊布標點法。將西國標點符號，施之於中國新舊文學。迄今出版書有完全採用西國標點法者，亦有僅用逗句及人地名書名諸符號者。以前中國書無標點法，誠爲中國文學發達上一缺點。甚多古書，如元典章等，無從句讀，或極可疑，又如各史四裔傳，或遼金元史外國地名，人名，數個相聯者，莫辨名性。標點法輸入以後，此種困難疑竇，可以盡去。近代歐化有益於中國文藝，中國文藝亦受世界潮流而歐化矣。胡適倡議文學須研究白話小說。各大學國文學系，多增小說課程。而郭沫若及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皆以作白話新小說或譯外國小說名於世。

西洋美術　美術者繪畫、彫刻、塑像諸藝術也。中國人自昔以百工爲小技。繪畫、彫刻、塑像、皆在小技之列。唐初閻立本以丹青見知，與廝役等。戒子愼毋習。社會所尙可知。故美術在中國不甚發達。尤以宋代以後，益不昌明。宋太宗嘗下令不許百工與文人齊等。在上既不以爲倡，而在下者益廢弛矣。較之西洋美術名家，一畫値錢百萬，爲全世歡迎，與中國相去眞天淵矣。近今西洋各種

文化如怒潮之輸入中國，然美術則輸入則極緩而最後。誠以美術爲太平時代之裝飾品，而一時習尚又不易改革。方今全國鼎沸，民生困苦，社會對此無需要，教美術者不足以立足也。民國以來，最先提倡美術者爲蔡元培。蔡氏曾以高年留學德國。甚留心於西洋美術。曾助德人蒙斯脫白格著中國美術史。民國六七年間，充北京大學校長時，曾提議於教育部，在北京立藝術專門學校。內分中國美術及西洋美術兩部。但學校成立以來，爲時代政治潮流所驅，風潮屢起，校綱廢弛。不免有負於提倡人之初心。近則教育部已有令結束矣。上海有私立美術專門學校。成績尚佳，國中傳授西洋美術著聲譽者，有劉海粟及汪亞塵二人。